

## 目錄 Contents

---

### ◆ 常州研究 ◆

- 常州歷史與文化入門書目 ..... 周佳榮 113  
常州文學三派研究專著提要 ..... 丁潔 117

### ◆ 史料評介 ◆

- 香港海關歷史資料評介 ..... 區志堅 蔡思行 123

### ◆ 讀書札記 ◆

- 才女和女四書——讀黃嫣梨《女四書集注義證》 ..... 黃季耕 130

### ◆ 書評 ◆

- 何方昱著《科學時代的人文主義：〈思想與時代〉月刊  
(1941-1948) 研究》 ..... 文兆堅 133  
葉嘉熾著《民國時期的健康和國家重建：1928-1937 年間  
現代健康服務的發展》 ..... 廖懷恩 136  
《鼠疫、沙士和香港醫學的故事》 ..... 廖懷恩 139

### ◆ 學界動向 ◆

- 浸大歷史系 2010 年夏季活動報導 ..... 資料室 141  
「歷史講堂」五週年特刊 ..... 資料室 143

❖ 常州研究 ❖

## 常州歷史與文化入門書目

周佳榮  
香港浸學大學歷史系

### 一、引言

常州在中國歷史上是人文薈萃、名家輩出之地，至清代文風尤盛，出現了以惲壽平（南田）為代表的常州畫派，以莊存與、劉逢祿為代表的常州學派，以張惠言為代表的常州詞派，以費伯雄（晉卿）、馬培之（文植）、巢崇山、丁甘仁（澤周）為代表的孟河醫派；此外，還有陽湖文派、毗陵詩派等。常州諸派雖然各自在其學術領域中獨當一面，實亦互有聯繫、互為影響，因此研究常州的學術派別，應從常州歷史文化入手。

張華、楊休、季士家著《清代江蘇史概》（1990年）綜論有清一代江蘇史事，從中可見常州在江南地區所擔當的角色；羅我白、史洪等著《常州史話》（1984年）概述常州古來的歷史發展，陳肅著《毗陵散筆》（1988年）、戴伯元著《常州文史雜談》（1998年）及江蘇省常州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常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常州掌故》（1998年）、《常州之最》（2006年）等均可增進對常州的認識。常州市文化局編著《常州文化志》（1999年）和常州市博物館編《常州文物精華》（1998年），是進一步探討常州文化和文物的專著。民間文獻材料的整理結集，如常州市民間文學集成編委會編《常州歌謠諺語集》（1989年）亦不宜忽視。

### 二、史事與掌故

■ 張華、楊休、季士家著《清代江蘇史概》，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170頁）

陳得芝於〈序〉中指出，本書「在全面系統敘述有清一代江蘇史的大框架下，作者對一些重要問題作了重點考察，進行詳細的論證，如江蘇建省的經過和年代問題，農業的發展，尤其是農產品商品化趨勢的增長問題，城市和市鎮的繁榮以及三種類型市鎮的劃分，資本主義萌芽的繼續增長及其因封建勢力壓抑而未能迅速發展問題等，幾乎都是可以獨立成篇的專題研究。此外，科學文化一章敘述尤詳，介紹了近百名傑出的科學家、醫學家、哲學家、文學家、戲劇家、史學家、畫家、版本目錄學家等各方面專家學者的成就，使讀者切實瞭解到江蘇的確是名家雲集、人才輩出之地。」

著者在〈引文〉中強調清代是江蘇歷史上尤為重要的一個發展時期，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江蘇在清代始正式建省，其政區範圍與現在大致相同；其二，江蘇依然是全國的財賦重心，社會經濟的發展出現了新氣象；其三，江蘇的科學文化更發達，「可以說，一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與清代江蘇學人密不可分」。正文分為四章：(一)清軍南下與江南抗清鬥爭；(二)清代江蘇的政治；(三)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四)科學文化的發達。書中的論述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限，〈結語〉認為「鴉片戰爭前後的江蘇歷史一脈相承，近代江蘇正是從清代江蘇發展過來的。清代江蘇在向近代轉型時，不少問題是值得深入探討的。」例如東南工商業中心從蘇州到上海的轉移，也許是十九世紀中國經濟史上最值得注意的現象，經濟中心的轉移，是研究清代工商向近代轉型的重大問題之一；清代中期以後，特別是1870年至1911年間江蘇農村經濟的發展也頗具典型性，探究導致這一時期江蘇農村生活狀況變化的諸種因素，能夠更清楚地說明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入侵與中國近代工業化進程的關係。

### ■ 羅我白、史洪等著《常州史話》，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年。(150頁)

本書共有二十三章，前半記敘常州自遠古至明代的發展概況，後半闡述常州自清代以來的社會文化，是認識常州歷史的普及讀物。為首一篇題為〈中吳要輔，八邑名都〉，交代了常州的地理概貌和歷史沿革；接著介紹遠古時代的常州居民，江南古城——淹城及齊梁故里——蘭陵古墟。

第五至十一章的主題包括：隋末管崇起義——常州最早的農民起義；晉陵紫筍和常州茶山；蘇軾和常州；紙城鐵人——常州歷史上一次壯烈的保衛戰；單鏢的《吳中水利書》和周忱治理芙蓉湖；明代散文家、抗倭英雄唐荆川；常州的東林黨人。

第十二章以龔自珍的兩句詩「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為題，介紹清代常州學術流派和主要學人；接著的四章敘述太平軍在常州、辛亥革命在常州、五四運動在常州，以及瞿秋白、張太雷青少年時代在常州。

第十七章至二十三章，依次是〈天寧寺、文筆塔和紅梅閣〉、〈著名的疊山家戈裕良和常州園林〉、〈常州的印書事業〉、〈常錫劇小史〉、〈從「透額羅」到燈芯絨〉、〈常州的宮梳名篦〉和〈常州新貌〉。書末有〈後記〉。

### ■ 江蘇省常州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常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常州掌故》，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263頁)

本書書首有周亞瑜〈序〉及〈編輯說明〉，收錄的文章有二百六十餘篇，分為七類：(一)人物珍聞，記述本籍或外籍在常州的名人故事；(二)史事沉跡，包括戰爭、事件等；(三)藝海拾貝，輯集詩、文、聯語等方面的趣事；(四)軼聞遺事，介紹朝野名流的事蹟；(五)要輔勝跡，記錄自然、人文景觀和歷史遺跡；(六)毗陵風物，包括有代表性和具地方特色的風俗民情、土特名優產品等；(七)地名趣談，所述都是常州某些寓意豐富的地名由來。書末有〈後記〉。

### 三、隨筆與雜記

#### ■ 陳肅著《毗陵散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228頁)

林非在〈序言〉中指出，本書「既是風土人情和家鄉史實的筆記，又是抒發作者自己感情的詩篇」，這個相當明顯的特點是本書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他舉例說：「像蘇軾和王安石跟常州的那段緣故，像岳飛在這兒抗金作戰取得的大捷，讀起來都很令人神往。至於講到常州本地的人文，那確實是寫得更為有聲有色了。惲南田的丹青，洪亮吉的文章，趙甌北的史論，段玉裁的樸學，黃仲則的詩歌，都是至今還可以使人增加見識和陶冶情操的。……」

本書分為六個部份：(一)滄桑篇，從〈淹城形似田螺殼〉到〈常州在飛〉，十六篇文章，扼要反映了常州歷史的變遷；(二)攬勝篇，收錄〈東南第一叢林〉、〈近園，江南園林的明珠〉等十二篇；(三)訪古篇，計有〈藤花舊館〉、〈荊川先生讀書處〉等十二篇，從攬勝到訪古，描繪了常州的城池庭院、廟宇古塔、長河小巷；(四)風流篇，多達十九篇，縷述古今人物事蹟，值得注意的是〈關於陳圓圓〉、〈盛宣懷與釣魚島〉、〈瞿秋白與玄妙觀〉、〈張大千與謝玉岑〉、〈趙元任的愛情〉等篇；(五)閒情篇，由〈清秋〉、〈涼夏〉到〈巷步〉、〈露珠小街〉，還有〈封神說〉、〈古銀杏〉、〈神樹〉、〈月季花〉、〈天燈〉等，凡十二篇；(六)方俗篇，首列〈梳篦絮語〉、〈漫說灘簧〉，復有〈「書生氣」辨〉、〈常州狀元考〉和〈古巷尋夢〉，最後以〈常州盆景的崛起〉和〈盆景園裏說盆景〉作結，共十四篇。書末有〈小跋〉。

#### ■ 戴伯元著《常州文史雜談》，南京：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1998年。(341頁)

本書收錄作者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八十多篇，分為四輯：(一)地方掌故，例如〈常州地名來歷淺介〉、〈「武進」由來探討〉、〈常州街巷地名趣談〉等；(二)名人紀聞，計有〈腸斷人琴話才女——陸小曼的一生〉、〈李伯元家世考〉、〈黃仲則詩詞版本滄桑錄〉等；(三)鄉里風情，包括〈漫話古運河風光帶〉、〈東坡在常州遺跡考〉、〈常州傳統文化、特產及民俗風情〉等；(四)藝苑擷芬，收錄〈常州民間石刻考〉、〈常州最早的戲院——逸仙戲院〉、〈清末以來常州的京昆活動〉等。書末有〈跋〉及〈編後記〉。

#### ■ 中共常州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常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常州之最》，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年。(313頁)

書首有居麗琴的〈序〉，指出常州這座江南古城，積澱了豐厚的文化底蘊，締造了無數個屬於自己的歷史之最。正文共有四百六十二則，按照建置、自然、政治、農業、工業、商業、旅遊、城建、交通、郵電、金融、教育、文化、衛生、體育、宗教、人物的大致分類作出編排，以〈最早的地域名稱〉開篇，而以〈最早的歷史學家〉作結。書末有〈主要參考書目〉和〈後記〉。

正如序言所說，每一條常州之最就是一個歷史片段。當中有些記錄，甚至是中國之最，例如蕭統主持編選的《文選》(又稱《昭明文選》)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詩文總集，盛宣懷在上海創辦的中國通商銀行是第一家華資銀行，王承榮是最早自製中國電報機的人，吳夔梅是中國最早開創鉛筆業的人，丁甘仁首創中國中醫學校，劉海粟首創中國美術學校等等，不勝枚舉。

#### 四、文獻與文物

■ 常州市民間文學集成編委會編《常州歌謠諺語集》，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9年。（204頁）

本書是《常州市歌謠集》和《常州市諺語集》的匯編，共收常州市所轄四個區（鐘樓、天寧、郊區、戚墅堰）、三個縣（武進、金壇、溧陽）廣為流傳的民間歌謠 204 首和諺語 2,774 條。書首有李文瑞〈序〉和〈編輯凡例〉，正文分為兩部份：一、歌謠，包括勞動歌、時政歌、儀式歌、情歌、生活歌、歷史傳說歌、兒歌、雜歌；二、諺語，計有時政類、事理類、修養類、社交類、生活類、自然類、生產類、其他類。書末有〈後記〉，附錄〈常州歌謠、諺語普查選編一覽表〉、〈常州市圖〉。按：本書是「中國民間文學集成」的一種，《常州民間故事集》是本書的姊妹篇。

■ 常州市博物館編《常州文物精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141頁）

本書是在常州市博物館成立四十年之際編輯出版的，選出一百二十二件（組）文物，包括陶瓷、玉器、漆器、木器和其他工藝品，以及明、清和近代書畫，藉此展示該館的工作成績和研究成果。書首有陳麗華撰〈前言〉，概述常州文化概況和該館館藏文物；彩色圖版均有扼要說明，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項：其一，常州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較為豐富，經歷了馬家浜、崧澤、良渚文化三個階段；其二，東漢至明代的瓷器是該館收藏的大宗，館藏宋代漆器尤以考古發掘品為多數；其三，常州素為人文薈萃之地、墨客雅集之邦，歷史上人才輩出，該館的書畫藏品除本地名家外，也有歷史上著名書畫家的作品。唐順元、孫慎行、惲向、惲壽平、唐宇昭、錢維城、洪亮吉、孫星衍、張惠言、莊存與、劉海粟等人的書畫固然在搜羅之列，文徵明、謝時臣、吳偉、張瑞圖、鄭燮、朱耷、任頤、齊白石、徐悲鴻等人的作品亦有珍藏。正如〈後記〉所說：「其中不乏國內僅見的珍品，更是我館的鎮館之寶；既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學術價值，又具有較強的藝術性、欣賞性和濃郁的地方特色。」

■ 常州市文化局編著《常州文化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44-264頁）

書首有吳伯瑜的〈序〉，然後是〈凡例〉、〈總述〉和〈大事記〉。正文分為七篇：（一）〈機構〉，分為行政、中共組織、社會團體、民主黨派四章；（二）〈文學〉，包括詩歌、散文、小說、民間文學、學術研究五章；（三）〈藝術〉，計有戲劇、曲藝、影視、美術、音樂舞蹈、表演藝術團體、演出場所、藝術教育、創作和研究機構九章；（四）〈群眾文化〉，包括創作和研究、群眾文化活動、文化館和站、業餘藝術團體四章；（五）〈圖書〉，計有圖書館、書店、刻書舖和出版單位三章；（六）〈文博〉，分為文物、博物館兩章；（七）〈人物〉，分上、下篇簡介歷代名人。書末有附錄和〈後記〉。

總的來說，本書記述的地域範圍，立足常州市區（城區、郊區、新區），兼及所轄的縣級市；所載內容，由古代至二十世紀末，因事而異，大抵涵蓋了常州二千五百年的文化發展。

❖ 常州研究 ❖

## 常州文學三派研究專著提要

丁 潔

香港浸學大學歷史系

常州文化在清代以來的思想文化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席位，出現了常州學派（今文學派）、常州詞派、陽湖文派、常州畫派和孟河醫派（常州醫派），合稱「常州五派」，此外還有較爲人所忽略的毗陵詩派。近年來上述各派均有學者作出專門研究，發表了不少論著，文學方面，以探討常州詞派最多，陽湖文派和毗陵詩派也有專書出版，「常州文學三派」的研究規模已見具備。除了地緣因素外，人脈關係和思想淵源也是很重要的，相信今後會更爲專家學者所注意，三派之間的聯繫和相互影響亦不可忽視。（參閱附表）

常州文學三派主要成員一覽

派別	創始者及代表人物
陽湖文派 （陽湖古文派）	先導者：惲敬、張惠言、李兆洛 主要成員：祝百十、陸繼輅、丁履恒、莊綬甲、董士錫 尾聲：方恂、徐震
常州詞派	發軔期：張惠言、李兆洛，黃景仁、錢季重、陸繼輅、左輔、惲敬、丁履恒；第二代成員以周濟爲突出，另有董士錫、宋翔鳳 拓展期：從許宗衡、端木埰、蔣春霖到莊棫、譚獻，是其發展、變化的時期 光大期：馮煦、陳廷焯，及晚清四大詞人王鵬運、鄭文焯、朱祖謀、況周頤
毗陵詩派	毗陵四家：鄒祇謨、董以寧、陳玉璣、龔百藥 毗陵六逸：楊宗發、惲格、胡香吳、陳煉、唐靖元、董大倫 毗陵七子：洪亮吉、黃仲則、孫星衍、趙懷玉、楊倫、呂星垣、徐書受 毗陵後七子：吳韻鴻、莊縉度、趙申嘉、周儀顯、陸容、徐延華、汪士進

關於明清時期的詞派和詞學，可參考姚蓉著《明清詞派史論》（2007年）及吳宏一著《清代詞學四論》。較早研究常州詞派的專著，是吳宏一著《常州詞學研究》（1970年）；其後出

版的，有趙伯陶著《張惠言暨常州派詞傳》（1999年）、徐楓著《嘉道年間的常州詞派》（2002年）和朱德慈著《常州詞派通論》（2006年）。近年常州詞派成爲研究熱點，新著有黃志浩著《常州詞派研究》（2008年）、遲寶東著《常州詞派與晚清詞風》（2008年），以及錢璣之、錢旭初著《常州詞派研究評析》（2008年）等，但後者尙未得見。陽湖文派方面，早前已有曹虹著《陽湖文派研究》（1996年）；劉世南著《清詩流派史》（1995年），有專章探討常州詞派；紀玲妹著《清代毗陵詩派研究》（2009年），是新近出版的這方面專著。

## 一、陽湖文派

### ■ 熊禮匯著《明清散文流派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575頁）

本書自〈緒論〉以下，共有七章：一、〈宋元散文發展傾向論〉；二、〈台閣派論〉；三、〈秦漢派論〉；四、〈獨立派論〉；五、〈唐宋派論〉；六、〈公安派論〉；七、〈桐城派論〉。〈總論〉集中闡釋明清散文流派形成、演變的特點，流派迭出的歷史意義以及對今人的啓發。書末有主要參考書目和〈後記〉。

著者在第七章中指出，「清代受桐城派影響而被後人視爲古文流派的作者群體有二，一曰陽湖派，一曰湘鄉派。它們的散文主張和桐城派有聯繫，也有區別。」並且析述了陽湖派與桐城派文論之異同，強調一是文風取向，折中於「檜楫（棒）氣」與「袍袖氣」之間，這兩者並非等於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而近於今日所講「火藥味濃」與「疲軟無力」之間；二是主張承續諸子百家散文的藝術傳統，以起「文集之衰」；三是主張奇偶「相雜迭用」。

### ■ 周寅賓著《明清散文史》，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324頁）

本書是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十五規劃項目「中華分體文學史」的成果之一。全書分爲十一章：第一章〈概論〉；第二章〈明初散文〉；第三章〈台閣體與茶陵派〉；第四章〈前後七子〉；第五章〈唐宋派與明中後期哲學家的散文〉；第六章〈公安派與竟陵派〉；第七章〈晚明小品文與其他散文〉；第八章〈清初散文〉；第九章〈桐城派〉；第十章〈陽湖派與清前期不屬流派的古文家〉；第十一章〈清前期駢文〉。每章先有概述，進而對代表人物作出詳解。書末有〈後記〉。

其中第十章〈陽湖派與清前期不屬流派的古文家〉述及了常州的陽湖文派，並介紹了代表人物惲敬、張惠言，以及其他成員。著者認爲「陽湖派是桐城派的支派。但是，兩派的文論與文風又有區別。在義的方面，陽湖派不囿於儒家義理，而『泛濫百家』；在法的方面，不拘守常法，也注意變法，並強調文意，不孤立講法。」

### ■ 曹虹著《陽湖文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280頁）

書首有程千帆的序，正文主要分爲三部份：（一）「緒論」包括第一章〈陽湖文派研究序說〉；（二）「總論」包括第二章〈「殆將有變」的時代〉、第三章〈獨特的學術之鄉〉、第四章〈常州女學與陽湖文派〉、第五章〈陽湖文派的崛起〉、第六章〈「文體不甚宗韓歐」——散文理論與創作風格的突破〉、第七章〈陽湖派與桐城派的關係〉；（三）「分論」包括第八章〈「淵雅」之人，恢閎之文——論張惠言〉、第九章〈「峻拔」的藝術個性——論惲敬〉、第十章〈「通脫」的內蘊——論李兆洛〉、第十一章〈「菀菀多病，時時傷心」——論陸繼輅〉及第十二章〈結語——陽湖文派的歷史地位〉。

著者在〈結語〉中提到：「如果說桐城派的某些方面較能折射出清代文化的正統性格的話，那麼陽湖派的風貌則較能典型地體現出其折衷性格。清代文化，無論是學術，還是文學，包括詩學、文章學等，都有鑒於明代的偏激與門戶之習，因而較少過激之表現。陽湖派在創作理論上講究學與文、才與法、駢與散諸種關係的統合，在創作風格上表現為『不甚宗韓歐』，亦奇亦正、有文有質等，都表現出較強的圓融通變的生機。……這種對傳統亦即亦離、不即不離的形態，體現了創新與融合、繼往與開來的兼攝關係，也是陽湖文派的特質所在，從而決定了其特定的歷史地位。」書末附錄〈陽湖派主要作家簡譜〉、〈引用書目〉，並有〈後記〉。

## 二、常州詞派

### ■ 姚蓉著《明清詞派史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253頁)

本書以明清時期的雲間詞派、陽羨詞派、浙西詞派和常州詞派及其分支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圍繞其詞學思想及創作風貌展開論述，探討了明清詞派間的傳承和流變關係，勾勒出明清詞壇的整個歷史概況。書首以〈緒論：百年明清詞派研究的進程與展望〉作為開篇，下分五章，分別是：一、〈明清詞派總述〉；二、〈雲間詞派〉；三、〈陽羨詞派〉；四、〈浙西詞派〉；五、〈常州詞派〉。書末有〈主要參考文獻〉和〈後記〉。其中常州詞派一章分為四節，論述常州詞派的興起、常州詞派的理論建樹、常州詞派的詞創作，以及常州詞派的後繼：臨桂詞派。常州詞派的地位，作者作了這樣的評價：「常州詞派以其鮮明的詞學理論、眾多的創作人員、廣泛的文學影響，成為清代後期最顯赫的詞派。」

### ■ 吳宏一著《清代詞學四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313頁)

本書內容介紹中提到：「清代時中國詞學復興的時期，與經史之學鼎足而立；而常州派則為清代詞學的重鎮，『嘉慶以來名家均從此出』，尤其是在詞論方面的表現，更值得注意。本書以常州派為骨幹，上論順康時期大家王士禛，下及晚清況周頤、王國維的詞話雙璧，一氣呵成，清代詞論的精華，盡在其中。」

全書主要由四篇文章組成，分別是：〈王士禛的詞集與詞論〉、〈常州派詞學研究〉、〈《蕙風詞話》述評〉和〈王靜安境界說的分析〉。其中〈常州派詞學研究〉佔了三分之二篇幅，此文曾在1970年由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印成單行本，是最早研究常州詞派的學術專著。

### ■ 吳宏一著《常州派詞學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70年。(154頁)

本書是著者的碩士論文，是最早專門研究常州詞派的學術著作之一。全書分為五章：第一章〈緒論〉，解釋為何研究常州派詞學和如何研究常州派詞學這兩個問題；第二章〈常州派的時代背景〉，分別從政治背景、社會環境、文學思潮窮極則變的定律等幾個方面來探討；第三章〈常州派詞論的探究〉，內容包括評論原理的探究、鑑賞論及考證、創作論、源流正變的討論等幾個方面；第四章〈常州派詞論的反響〉，依次論述了反響的前奏曲、反響的序幕、反響的高潮，以及反響的餘波；第五章是〈結論〉。

作者總結常州派詞學研究的要義有四：「一、常州派的詞學，深受當時政治背景、社會環境的影響。二、常州派詞論以寄託說為主，其他的評論皆以此為理論的根據。其評論雖有失當之處，然尊體之功，實肇因於此，故可謂『大醇而小疵』。三、常州派詞論影響後世最大。」

四、常州派詞家以張惠言和周濟為最重要，若僅就詞論而言，則周濟的地位，應該遠較張惠言為高。」至於常州派詞學對後世的貢獻，作者將其歸納為兩點：「一、以寄託說詞，使詞在言志、載道之餘，能夠與詩賦同類諷誦，扭轉了詞為小道的觀念，提高了詞的地位，可謂是『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自此之後『弄筆者始知自振』。二、為後來的詞學評論，建立了評論的依據。」書末附錄〈常州派詞家年表初編〉。

■ 趙伯陶著《張惠言暨常州派詞傳》，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624頁)

本書是費振剛「中國歷代名家流派詞傳」的一種，書首有〈常州詞派的理論建設及其創作實踐〉一篇長文，指出「同浙西詞派一樣，常州詞派雖以地名為標誌，卻非一個地域性的文學流派。」著者張惠言為常州派的開山，有建論建樹；周濟無疑是繼張惠言之後的中堅人物，陳廷焯也是不能忽視的理論家，與王鵬運、朱孝臧、鄭文焯合稱「清末四大家」的況周頤，是清季詞壇拓展常州派理的最後一位大家。全書以詞選為主，包括洪亮吉、黃景仁、左輔、惲敬、張惠言、劉嗣綰、張琦、錢季重、李兆洛、丁履恒、陸繼輅、金應城、金式玉、鄭掄元、宋翔鳳、周濟、董士錫、蔣學沂、王曦、湯成烈、周騰虎、莊棫、譚獻、沈昌宇、王鵬運、陳廷焯、鄭文焯、朱孝臧、況周頤的作品。

■ 徐楓著《嘉道年間的常州詞派》，台北：雲龍出版社，2002年。(438頁)

本書論述了清代嘉慶、道光之際的常州詞派。著者在〈自序〉中開宗明義地提到：「這一時期，是中國古代文學史的最後一頁，也是常州詞派的發軔和發展期。在這四十多年中，各中堅人物勇於立論，迭相推衍，從整體上構成了獨具特色的詞論體系。嘉道之際，常州詞派的代表人物大多為經學家、文學家，能博取廣涉而不限於詞學一隅，其詞論於經學、詩學、散文、駢賦有兼收並蓄之特點，尤顯『學人之詞』的特色。尊詞體，重意格，講究問有其質，使『接風騷之真脈』，是常州詞派貫穿始終的理論綱領。其精神內涵與儒家詩教有著某些內在聯繫，對端正詞風有積極意義。」

全書分七章：一、〈常州詞派產生的時代背景與文化動因〉；二、〈常州詞論的文化構成和影響來源〉；三、〈常州詞派前期詞人傳論〉；四、〈張惠言的《詞選》與詞論〉；五、〈董士錫對常州詞論的繼承〉；六、〈周濟對常州詞論的發展〉；七、〈論常州詞派的創作〉。附錄〈同心圓擴大：「比興論」傳的活動類型與模式〉和〈張惠言批校張炎《山中白雲詞》〉，書末有〈主要引用書目〉。

■ 朱德慈著《常州詞派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69頁)

著者在〈前言〉中提到：「本書在重新梳理常州詞派形成因素、發展階段、衍生譜系和批評家法的基礎上，著重對該派的創作實績展開全面深入的解剖、總結。既抽繹出該派成員趨近的創作家法，又對不同時期代表作家的創作成就、個性特色作出細緻的辨析。提出：常州詞派產生後逐漸變成『守成型』與『變革型』兩大支系；它是一個從批評到創作始終處於與時俱進、兼融並包態勢下的開放性詞派；努力使自己的創作能夠充分地反映時代風雲與士人心態，實現『詞亦有史』，是這一詞派成員的共同追求。」

本書正文分為九章：一、〈常州詞派形成因素〉；二、〈常州詞派的分期與譜系〉；三、〈常州詞派的批評「家法」〉；四、〈常州詞派的創作「家法」〉；五、〈常派前期諸子論〉；六、〈常

派「守成型詞人」)；七、〈端木採詞學思想及其詞作實踐〉；八、〈「四大詞人」的創作道路與共同傾向〉；九、〈「四大詞人」的藝術風格〉。書末有〈主要參考文獻〉和〈後記〉。

■ 黃志浩著《常州詞派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289頁)

著者在介紹本書內容時指出：「形成於清代中葉的常州詞派，以其頗具特色的理論體系和創作實績，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重要地位和深遠影響。作為學者型的詞人群體，常州派詞人將治學的方法和思維運用到詞學上，其詞學道路，既富於理性之精神，又具有探索性之品格。他們在堅持詞學本色論的同時，引入詩學中的比興、寄託等表現手法，並進行了發揮與創新，在詞學的審美理想、功能論、創作論、鑒賞論、音律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主張。他們標舉兩宋詞人周邦彥、辛棄疾、吳文英和王沂孫等四家詞，既為後學指出了一條學習的路徑，也使之成為常州派詞學倡導的形象化樣本。」

書首有〈緒論：常州詞派的研究及其方法〉，其後分為七章：第一章〈常州詞派的形成〉；第二章〈常州詞派的分期及其早期特點〉；第三章〈張惠言對常州詞派的開創〉；第四章〈董士錫對常州派詞學的修正〉；第五章〈周濟對常州派詞學體系的奠定〉；第六章〈常州詞統的建立〉；第七章〈常州詞派的流布與嗣響〉。書末有〈主要引用書目〉和〈後記〉。

■ 遲寶東著《常州詞派與晚清詞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年。(295頁)

本書是著者的博士論文，書首有葉嘉瑩和陳洪的序。著者在〈緒論〉中提到本書的要點有三：第一，以詞的美感特質為主要線索，為張惠言、周濟、譚獻、陳廷焯、況周頤等常州詞派主要代表人物擬構理論體系，以期更加充分地揭示他們的理論內涵，以及他們在詞學思想史上的應有地位。第二，分析常州詞派代表詞人的代表詞作，揭示其在藝術上的成就與不足，分析個中原因，並分析其與常派詞學思想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及其在詞史之中所應佔有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填補詞史研究的這段空白。第三，歸納常州詞派在理論與創作兩方面的發展脈絡及演變規律，分析并指出後繼者對前人的繼承與革新之處，並對給常州詞派形成、發展與接受造成影響的深層文化因素進行探討。

正文分為兩部份：(一)「形成篇」，探討嘉道時期常州詞派的形成、詞學思想和創作傾向；(二)「接受篇」，研究文化激蕩與常州詞派的一統詞壇、同光時期常州詞派的詞學思想與創作傾向、常州詞派影響下的清季詞風。書末附錄〈清代中晚期詞學簡表〉、〈主要徵引與參考書目〉，並有〈後記〉。

### 三、毗陵詩派

■ 鄭子運著《明末清初詩解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257頁)

「詩解」作為一種詩歌接受方式，出現於宋末元初；作為一個詞，則直到清代雍正年間才出現。徐有富在〈序〉中說，此書論述了注釋、講學、詩文評點、詩話、公文批答，以及八股文、詩歌創作流派等因素對詩解形成所產生的影響，並對明末清初的詩解代表作進行了個案研究。〈緒論〉以下，分為六章：第一章〈詩解的形成〉；第二、三章〈解詩者的生平及其詩解的價值〉上、下；第四章〈八股文對詩解的滲透〉；第五章〈明清之際的詩壇各派在詩解中的反映〉；第六章〈詩解的影響〉。書末有〈主要參考文獻〉。

著者在第六章第三節專論詩解與常州詞派，指出「常州詞派不同於浙西詞派，除講究比興寄託外，還重視筆法。拿常州詞派論著中的筆法與詩解中的筆法略作比較，兩者有不少相似之處。尤其是金聖嘆的詩論，與常州詞派相似的最多，……在有些方面，甚至可以說，金聖嘆開常州詞派的先鞭。」

### ■ 劉世南著《清詩流派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593頁)

本書以前、中、晚三期對清詩流派的發展作了考察，依次分析各個流派及每一流派作家的思想和藝術特色。全書在〈前言〉之下分為三部分二十一章：「前期」有（一）〈河朔詩派〉、（二）〈嶺南詩派〉、（三）〈顧炎武〉、（四）〈虞山詩派〉、（五）〈婁東詩派〉、（六）〈秀水詩派〉、（七）〈神韻詩派〉、（八）〈清初宗宋派〉、（九）〈飴山詩派〉；「中期」有（十）〈浙派〉、（十一）〈格調詩派〉、（十二）〈肌理詩派〉、（十三）〈性靈詩派〉、（十四）〈桐城詩派〉、（十五）〈高密詩派〉、（十六）〈常州詩派〉；「後期」有（十七）〈龔自珍〉、（十八）〈宋詩運動和同光體〉、（十九）〈漢魏詩派〉、（二十）〈中晚唐詩派〉、（二十一）〈詩界革命派〉。

其中第十六章〈常州詩派〉分為甲、乙、丙、丁四節，分別討論了常州詩派的產生、常州詩派的詩論、常州詩派的傑出詩人黃景仁，以及常州詩派及其影響。著者指出：「常州是詩派的詩人，大抵受儒家正統思想影響很深，實踐忠、孝二字，都想一展修齊治平的抱負。忍忍生性鯁直，嫉惡如仇。然而並不迂腐，往往縱情聲色，富於豪氣，都是些聖賢豪傑二者欲兼的人物。……反映在詩論上，便有如下幾點：（一）強調作者性情、學識、品格，認為這是其詩作傳與不傳的決定因素。……（二）主張奇而入理。……（三）反對俗與滑。……（四）認為詩必有珠光劍氣，始不磨滅。……（五）主張多讀書。」

### ■ 紀玲妹著《清代毗陵詩派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年。(348頁)

本書是在著者的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的學術專著，書首有陳書錄的序。作者在書中提及：「毗陵詩派是清代帶有明顯地域性的詩歌流派，詩人群體都來自武進、陽湖兩邑，在共同的自然地理環境、歷史文化背景、社會交往關係等影響下，形成了該詩派獨特的、帶有地域文化色彩的特點。毗陵詩派雖然不如陽湖文派及常州詞派影響之大，但不可否認它在理論和實踐上所取得的成績，以及在清詩史上的地位和意義。」

〈緒論〉之後，分為七章：第一章〈「幸生君子里」——毗陵詩派形成的地域文化觀照〉；第二章〈「骨節疏頑性孤鯁」——毗陵詩人的文化人格〉；第三章〈「獨向毫端挾性情」——毗陵詩派的詩論及與性靈派的區別〉；第四章〈「非時不苟出，天下有誰知」——清初毗陵詩群的詩歌創作〉；第五章〈「抑情無計總飛揚」——清中葉毗陵詩群的詩歌創作〉；第六章〈「塞北交南萬里賒」——毗陵詩派的邊塞詩〉；第七章〈「毗陵多閨秀」——清代毗陵閨閣詩〉；之後是〈結語〉。書末有〈參考文獻〉和〈後記〉。

### ■ 許雋超著《黃仲則年譜考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418頁)

詩人黃仲則的年譜，在此之前有兩種：一是清人毛慶善、季錫疇編《黃仲則先生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另一是民國時期黃逸之編《黃仲則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許雋超編著的年譜考略，以上述二者為基礎加以增修，體例亦沿用其綱目體；材料方面，主要參考黃仲則《兩當軒集》和現存手跡，以及往來師友的詩文集。附錄民國《浮橋黃石宗譜》卷首序。書末有〈參考書目〉及〈跋〉。

❖ 史料評介 ❖

## 香港海關歷史資料評介<sup>1</sup>

區志堅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

蔡思行

香港大學歷史系

海關既管理及推動海舶貿易，也扮演了溝通中外文化的重要機構，中外學界已研究晚清至民國時期中國海關歷史，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撰寫 *Trade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及 *Robert Hart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His Journals, 1863-1866* 兩書，提倡要多研究近代中國海關貿易，與中外文化交流、中國政府走向現代化歷程的關係。因 1900 年前北京的中國海關檔案，多在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時被毀，為了解中國海關的發展，費正清曾編纂中國海關第二任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於 1868 年至 1907 年，寫給中國海關駐英國辦事處秘書金干登（James Duncan Campbell）的信件，此亦成為研究晚清中國海關史的重要資料。<sup>2</sup> 至於 1900 年至 1945 年中國海關的檔案，多存於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全宗號 679 及 2085 號，共 55,000 多件檔案資料。英國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歷史系與 Gale Group 合作，將藏於該檔案館 258 卷微縮膠片中國海關檔案資料編列成搜尋目錄，以方便研究。<sup>3</sup> 為了推動中國海關史研究之風，1988 年、1990 年及 1995 年分別在香港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廈門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三屆中國海關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的中外學者對中國通商口岸的海關歷史作出多方面的探討。近年中國海關出版社出版了《中國近代海關常用詞語：英漢對照寶典》、《中國近代海關地名錄：英漢對照》等一系列中國海關歷史研究的工具書及資料，使學者更容易掌握中國海關內各職行政架構、行政人員的名字及部分檔案資料。此外，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了由 1859 年至 1948 年中國各地海關的原始檔案資料，出版了共 170 冊的《中國舊海關史料》，此資料成為中國海關歷史研究者必要參閱

---

1 承蒙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海關資助研究，特此致謝。

2 參見 John King Fairbank, Jatherine Frost Bruner, Elizabeth MacLeod Matheson eds., *The I.G. in Peking: 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8-1907*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I.G. 為中國海關總稅務司（Inspector-General）的簡稱，職位相當於現在中國海關關長。

3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Project,” available on-line from <http://www.bristol.ac.uk/history/customs/>; internet; accessed on 12 December 2009. 由於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歷史系編輯的中國海關檔案目錄並未公開發佈，學者如需要前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尋找中國海關檔案資料，可將需要搜尋的中英文關鍵詞，電郵至 [hist-customs@bris.ac.uk](mailto:hist-customs@bris.ac.uk) 垂詢。

的文獻。然而，上世紀二十年代，香港總督英人金文泰（Sir Clementi）已認為位於南中國的香港，扮演了廣東省以至各通商口岸進行轉運貿易（transit trade）的其中一個必經之地，研究中國海關史的學者濱下武志更認為香港作為沒有課稅的「自由港」，在貿易、金融、商務以至勞工出口等領域發揮中轉功能，對中國沿岸和東南亞貿易圈發揮重要的角色，但較少學者注意香港海關歷史，也未注意整理香港海關檔案資料。<sup>4</sup>

其實，香港海關自成立至今，引進各國新知，為市民健康、工商貿易、社會安定繁榮做出積極的貢獻。海關更肩負把守邊境的重責，如緝毒、查禁武器、限制高危物品的進出口、保護知識產權、貿易管制等，對維護及推動境內外政治、列國安全經貿發展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時，香港位於中國國境的南方，海、陸、空交通便利，為西方物資進入中國內陸及協助中國物品出口的重要大門，成為中外物資的「集散地」。因為交通方便，香港也成為中外商旅及遊客必經的地方。香港海關遂成為本地出入口的「把關人」。

香港海關的地位在整個中國，乃至推動國際貿易上起了極重要的地位，而香港海關自 1909 年成立緝私隊至今，已經一百年，雖然其間名稱屢易，但工作性質日漸重要，工作的範圍自定期掃毒及打擊走私的工作外，廣至打擊翻版、保障消費者權益及市民健康，以至防範恐怖分子利用輸美貨櫃進行恐怖襲擊，保障國際社會的貿易安全！香港海關工作範圍日漸擴闊，架構日漸發展，從中可見香港在南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經貿發展及內部社會民生的面貌。

從香港海關的工作性質不斷改易及擴大，也可見香港社會經濟歷史的發展，如晚清民初，香港海岸走私毒品活動活躍，海關主要負責緝毒的工作。至五、六十年代，因香港酒精飲品事業發展蓬勃，香港政府曾對酒精飲品徵稅，也因其時市面流行假酒，不少市民飲下而導致失明，海關也大舉查禁假酒。近年，香港歌影碟翻版活動猖獗，海關展開多次大型行動，與國內外不同執法機構及商業組織予以打擊，從海關多次修訂法例及執行的情況，可見香港社會及工商業發展的情況。

較少學者注意香港海關歷史的原因是香港海關的史料仍沒有系統的編纂和出版，香港海關的前身為緝私隊，此隊伍成立於 1909 年，可惜戰前關於緝私隊的檔案資料在香港淪陷期間被燒燬。然而，研究人員受「香港海關」資助，在過去近年半的時間展開了「香港海關百年史研究計劃」，開始搜集相關檔案及史料，發現關於香港海關歷史的原始史料，散見各香港法例，立法局會議記錄，政府、海關屬下各部門及英國殖民地部檔案，均可以開拓香港海關歷史研究。本文對香港海關歷史史料作簡單介紹，望學界多注意香港海關歷史研究，期望達到拋磚引玉之效。

至 2009 年，香港海關人員負責執行的法例有五十三條。要了解香港海關（前身為緝私隊）過去一百年負責執行法例範圍的變化，香港大學呂志和法律圖書館所藏的 *Ordinances of Hong Kong* 以及 *Regulations of Hong Kong* 實為必讀。它們分別記錄了自 1842 年開埠至現在（日治時期除外）每年刊登香港憲報的法例和法律公告（刊登法例的執行細則或細小的修訂）的條例原文。

香港海關的前身緝私隊在 1909 年 9 月 17 日成立，時間上正好和港督盧押（Sir Frederick Lugard）批准〈酒精飲品條例〉（*Liquors Ordinance*）通過為同一天。這條條例賦予出入口管

---

4 參見濱下武志：《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清末海關財政與通商口岸市場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 253-275。

理處處長 (The Superintendent of Imports and Exports) 任命「緝私隊緝私員」(Revenue Officers) 的權力，故緝私隊在戰前直屬於出入口管理處。在這條例的授權下，緝私員可以檢查任何懷疑藏有違反條例酒精的入口行李或貨品。<sup>5</sup> 1912年、1913年、1916年及1917年通過的〈緝私員拘捕權力條例〉(Revenue Officers Power of Arrest Ordinance) 及其修訂條例列明緝私員負責執行的職務範圍，除了檢查酒精外，更管轄槍械、危險貨品、鴉片、藥品、香煙、郵件、賭博、外國銅幣等。<sup>6</sup> 根據1915年頒佈〈進出口條例〉(The Imports and Exports Ordinance)，香港政府有權拒絕任何貨品的進出口，條例授權出入口管理處處長可以拘捕任何違反這條條例的人士及搜查經過香港的進出口貨物。<sup>7</sup>

根據香港法例的資料，1920年代緝私隊負責執行法例的範圍並沒有重大的變化。直至1930年，〈緝私員拘捕權力條例〉才再作修訂，這次新增了汽車燃油 (motor spirit) 作為緝私隊另一負責徵稅的範圍。<sup>8</sup>

1930年直至1947年既因為條例沒有修訂，也因為日本侵華及1941年12至1945年為日治時期，香港的華人緝私隊更沒有任何法例的修訂，此時可視為負責法例的真空期。1945年香港重光，1947年社會局勢日漸安定，隨著年代的推移，緝私隊所負責執行的法例範圍有更頻密的增刪，從中可窺見香港社會的發展以至和內地、國際關係的變化。1946年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國內局勢不穩。英國政府、港英殖民地政府 (以下簡稱港英政府) 為了維持與當時國民政府的友好關係，避免捲入中國內戰的旋渦，港英政府在1948年通過〈走私進入中國內地 (管制) 條例〉(The Smuggling into China [Control] Ordinance)，落實同年中國和香港政府簽署的《中港緝私協定》(Hong Kong–China Customs Agreement) 中，緝私隊和中國海關合作打擊利用香港附近水域向中國走私貨物活動的協定。<sup>9</sup> 另外，在〈進出口條例〉下，港英殖民地政府在1947年通過管制黃金進出口的命令，任何黃金的進出口都需要出入口管理處處長的批准。<sup>10</sup> 1950年韓戰爆發，英國為「資本主義陣營」的成員之一，故港英政府亦對北韓

---

5 The Liquors Ordinance, 1909,” (No. 27 of 1909), in *The Ordinances of Hong Kong, 1909*, 129–152.

6 “The Revenue Officers Power of Arrest Ordinance, 1912,” (No. 31 of 1912), in *The Ordinances of Hong Kong 1912*, 375; “The Revenue Officers Power of Arrest Ordinance, 1913,” (No. 6 of 1913), in *The Ordinances of Hong Kong 1913*, 19–20; “The Revenue Officers Power of Arrest Amendment Ordinance, 1916,” (No. 11 of 1916), in *The Ordinances of Hong Kong 1916*, 77–78; “The Revenue Officers Power of Arrest Amendment Ordinance, 1916,” (No.2 of 1917), in *The Ordinances of Hong Kong 1917*, 3–4.

7 “Importation and Exportation Ordinance, 1915” (No. 32 of 1915), in *The Ordinances of Hong Kong 1915*, 171–176.

8 “The Revenue Officers Power of Arrest Amendment Ordinance, 1930,” (No. 32 of 1930), in *The Ordinances of Hong Kong 1930*, 215–216.

9 “The Smuggling into China (Control) Ordinance, 1948,” (No. 51 of 1948), in *The Ordinances of Hong Kong 1848*, 231–236.

10 “The Importation of Gold (Prohibition) Order, 1947,” (Government Notification No. 379), in *Regulations of Hong Kong 1947*; “The Exportation of Gold (Prohibition) Order, 1947,” (Government Notification No. 380), in *Regulations of Hong Kong 1947*.

和中國實施禁運，<sup>11</sup> 由此可見中國以至國際局勢均影響香港緝私隊執行任務的情況。

1963 年通過的〈緝私隊條例〉(Preventive Service Ordinance) 和〈應課稅品條例〉(Dutiable Commodities Ordinance)，概括了今天海關主要的工作範圍。前者就緝私隊的責任、權力、紀律、架構和所負責執行的法例作出了詳細的界定，後者闡述了緝私隊對應課稅物品的規管細則，成為海關主要工作之一。<sup>12</sup> 根據 1963 年〈緝私隊條例〉的 Second Schedule 所載，緝私隊負責的法例範圍與戰前比較沒有太大的變化，基本上都是涉及酒精、外國銅幣、郵件、藥品和槍械。<sup>13</sup>

踏入 70 年代，隨著香港社會、經濟的發展、香港在國際事務方面責任的加重，香港緝私隊負責執行的法例已由防止進出口非法物品或未完稅貨品方面，向多元化的方向發展。〈版權條例〉(Copyright Ordinance)、〈不良刊物條例〉(Objectionable Publications Ordinance) 和〈動植物(瀕危物種保護)條例〉(Animals and Plants [Protection of Endangered Species] Ordinance) 分別在 1974 年、1975 年和 1976 年納入緝私隊的負責範圍。<sup>14</sup> 這說明了緝私隊在 70 年代開始，除了負責保護政府稅收和反走私的傳統海關工作外，它亦因應社會的發展，開始就保護版權、瀕臨絕種動物、管制淫褻物品的工作作出貢獻。

緝私隊負責法例邁向多元化的同時，緝私隊的行政架構在 70 年代亦有重要的變化。1977 年通過的〈緝私隊(修訂)條例〉(The Preventive Service [Amendment] Ordinance)，緝私隊正式改名為海關(Customs and Excise Service)。這時海關高層架構亦分作四個部分：海關總監(Commissioner)、監督(Superintendent)、督察(Revenue Inspector) 和緝私員(Revenue Officer)，<sup>15</sup> 此為日後 1982 年海關正式成為一獨立部門鋪路。

踏入 80 年代，海關繼續就社會的發展，增加執行法例的範圍。1981 年，廢除香港海關負責的〈槍械彈藥條例〉(The Arms and Ammunition Ordinance)，取而代之的是〈火器及彈藥條例〉(The Firearms and Ammunition Ordinance) 和〈武器條例〉(Weapons Ordinance)，前者負責槍械擁有的管理，後者負責監管武術團體藏有的武器。<sup>16</sup> 這和打擊當時三合會非法藏有

---

11 “The Exportation (Prohibition) (North Korea) Order, 1950,” (No. A. 149 of 1950), in *Regulations of Hong Kong 1950*, 297; “The Exportation (Prohibition) (Specific Articles) Order, 1950,” (No. A. 176 of 1950), in *Regulations of Hong Kong 1950*, 347–357.

12 “The Preventive Service Ordinance, 1963,” (No. 25 of 1963), in *Ordinances of Hong Kong 1963*, A107–A119; “Dutiable Commodities Ordinance, 1963,” (No. 26 of 1963), in *Ordinances of Hong Kong, 1963*, A120–A159.

13 “The Preventive Service Ordinance, 1963,” A115.

14 “Preventive Service (Amendment of Second Schedule) Order 1974,” (L.N. 1 of 1974), in *Regulations of Hong Kong 1974*, B3; “Preventive Service (Amendment of Second Schedule) Order 1975,” (L.N. 253 of 1975), in *Regulations of Hong Kong 1975*, B903; “Preventive Service (Amendment of Second Schedule) Order 1976,” (L.N. 235 of 1976) in *Regulations of Hong Kong 1976*, B1130.

15 “The Preventive Service (Amendment) Ordinance 1977,” (No. 46 of 1977), in *The Ordinances of Hong Kong 1977*, A183–A192.

16 “Customs and Excise Service (Amendment of Second Schedule) Order 1981,” (L.N. 361 of 1981), in *Regulations of Hong Kong 1981*, B1061; “Firearms and Ammunition Ordinance, 1981,” (No. 68 of 1981), in *The Ordinances of Hong Kong 1981*, A377–A402; “Weapons

武器從事犯罪活動有很大關係。除了武器外，販賣毒品的龐大收益，亦是支撐三合會猖獗犯罪活動的重要原因之一。故在 1989 年，〈販毒（追討得益）條例〉（Drug Trafficking [ Recovery of Proceeds ] Ordinance）亦劃入海關負責的範圍內。在條例的授權下，海關人員有權沒收毒販的販毒收益。<sup>17</sup>

80 年代末及 90 年代以後，海關新增執行法例，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保護香港市民的權益；二、履行香港對國際社會的責任。在保護香港市民的權益方面，海關負責的法例新增了 1992 年的〈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Toys and Children's Products Safety Ordinance），1993 年的〈空氣污染管制條例〉（Air Pollution Control Ordinance），1994 年的〈消費品安全條例〉（Consumer Goods Safety Ordinance）以及 2003 年的〈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Prevention of Child Pornography Ordinance），均是針對當時香港社會對保護兒童、保護消費者權益以及市民健康等問題的關注而通過的條例。<sup>18</sup> 在履行香港對國際社會的責任方面，海關新增負責的法例體現了國際局勢變化的影響。1989 年海關新增負責的〈保護臭氧層條例〉（Ozone Layer Protection Ordinance）就是因應 1985 年《維也納公約》和 1987 年《蒙特利爾議定書》而通過的。<sup>19</sup> 另一個履行國際公約的例子是 2003 年新增的〈化學武器（公約）條例〉（Chemical Weapons [ Convention ] Ordinance），這條條例根據 1993 年《巴黎公約》而制定對化學武器的規管。<sup>20</sup> 另外，1997 年通過的〈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Ordinance）和 1998 年通過的〈防止盜用版權條例〉（Prevention of Copyright Piracy Ordinance）都是海關與各國政府間互相合作移送罪犯、打擊盜版行為等，國際慣例及共識相接軌。<sup>21</sup>

雖然就 *Ordinances of Hong Kong* 和 *Regulations of Hong Kong* 的資料顯示 1920 年代至 1941 年香港淪陷前海關負責的法例並沒有重大變化，但根據藏於香港大學圖書館 Hong Kong Special Collection 的 CO129 英國殖民地部檔案資料顯示，自 1912 年中華民國建立後至 1949 年國民黨遷台前，香港政府和中國海關有密切的關係，正好為 1920 年代至 1941 年的香港海關歷史補白。根據 CO129/355 至 CO129/386 的檔案，由 1909 年至 1911 年滿清統治中國的最後

---

Ordinance, 1981,” (No. 69 of 1981), in *The Ordinances of Hong Kong 1981*, A403–A410.

17 “The Drug Trafficking (Recovery of Proceeds) Ordinance 1989,” (No. 35 of 1989), in *The Ordinances of Hong Kong 1989*, A320–A381.

18 “The Toys and Children’s Products Safety Ordinance 1992,” (No. 80 of 1992), in *The Ordinances of Hong Kong 1992*, A652–A695; “The Air Pollution Control (Amendment) Ordinance 1993,” (No. 13 of 1993), in *The Ordinance of Hong Kong 1993*, A160–A202; “The Consumer goods Safety Ordinance,” (No. 84 of 1994), in *The Ordinances of Hong Kong 1994*, A1200–A1246; “The Prevention of Child Pornography Ordinance,” (No. 31 of 2003), in *The Ordinances of Hong Kong 2003*, A1382–A1421.

19 “The Ozone Layer Protection Ordinance 1989,” (No. 24 of 1989), in *The Ordinances of Hong Kong 1989*, A248–A265.

20 “The 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 Ordinance,” (No. 26 of 2003), in *The Ordinances of Hong Kong 2003*, A1016–A1105.

21 “The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Ordinance,” (No. 87 of 1997), in *The Ordinances of Hong Kong 1997*, A2944–A3055; “The Prevention of Copyright Piracy Ordinance,” (No. 22 of 1998), in *The Ordinances of Hong Kong 1998*, A442–A485.

歲月，英國政府和中國海關曾就鴉片貿易問題發生爭拗，亦曾有雙方政府海關之間的會議。<sup>22</sup>

民國成立後，根據 CO129/432 至 CO129/471 的檔案資料，1916 年開始至 1921 年，英國政府再次就香港和廣東的海關事宜和中國政府進行多次的討論，殖民地部 (Colonial Office)、外交部 (Foreign Office)、港督之間亦就這些事宜作多次的書信往還。<sup>23</sup> 1921 年孫中山在廣東省建立政權，開始沒收廣東省的原屬英國管理的海關機構。<sup>24</sup> 1927 年蔣中正建立南京政權，公開爭取關稅自主權，此行為被英國政府形容為另一次在財政上對香港的「圍堵」(blockade)。雖然英國政府希望和一個統一的中國政府談判海關的問題，但因香港和廣東省地理及商貿關係上的緊密聯繫，港督向英國駐北京的領事建議和廣東省政府直接商討有關廣東省和香港關於海關問題的事宜。<sup>25</sup>

CO129/517, CO129/521 和 CO129/531 檔案分別收藏了關於 1929 年至 1933 年間中國和香港之間的海關協定的各項建議，亦為研究當時香港海關和中國海關互動關係的必要資料。<sup>26</sup> 1936 年英國政府有建立香港中國海關聯盟 (Hong Kong–China Customs Union) 的建議，<sup>27</sup> 然

---

22 “Opium Traffic,” CO129\_358\_388 files, 389–415; “China Trade Opium,” CO129\_360 files, 56–67; “Opium Licensing System at Canton,” CO129\_360 files, 68–72; “Customs Agreement with China,” CO129\_368 files, 379–384; “Draft Customs Agreement with China,” CO129\_372 files, 270–273; “Draft Anglo–Chinese Customs Convention,” CO129\_375 files, 278–295; “Draft Anglo–Chinese Customs Agreement,” CO129\_386 files, 79–82.

23 “Customs Agreement,” CO129\_432 files, 773–784; “Customs Agreement,” CO129\_433 files, 774–776; “Customs Agreement,” CO129\_434 files, 547–569; “Anglo–Chinese Customs Agreement,” CO129\_435 files, 127–133; “Draft Anglo–Chinese Customs Agreement,” CO129\_437 files, 675–682; “Anglo–Chinese Customs Agreement,” CO129\_441 files, 384–393; “Anglo–Chinese Customs Agreement,” CO129\_435 files, 439–440; “Anglo–Chinese Customs Agreement,” CO129\_447 files, 263–264; “Anglo–Chinese Customs Agreement,” CO129\_451 files, 313–314; “Anglo–Chinese Customs Agreement,” CO129\_455 files, 63–80; “Customs Agreement between Hong Kong and China,” CO129\_460 files, 119–123; “Proposed Customs Agreement between Hong Kong and China,” CO129\_471 files, 49–81.

24 Sun Yat–Sen’s Threat to Seize Kwang Tung Customs Revenue,” CO129\_481 files, 446–452; “Threat of Canton Government to supersed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t Ports under their Control,” CO129\_482 files, 350–358; “Seizure of Canton Customs by Sun Yat–Sen,” CO129\_486 files, 453–359.

25 Governor Sir Cecil Clementi, 12 August 1927, to British Consul–General, Peking, CO129\_501\_8 files, 43–56.

26 “Proposals for Chinese frontier guard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Chinese Customs,” CO129\_517\_1 files, 1–185; “Further correspondence on proposed Chinese and Hong Kong agreements over Customs,” CO129\_517\_2 files, 1–121; “Chinese Customs: Proposed agreement with Hong Kong,” CO129\_521\_12 files, 1–282; “Chinese Customs: Proposed agreement with Hong Kong,” CO129\_521\_12 files, 1–282; “Chinese Customs: Proposed agreement with Hong Kong,” CO129\_521\_13 files, 1–531; “Chinese Customs: Proposed agreement with Hong Kong,” CO129\_521\_14 files, 1–143; “Chinese Customs: Proposed agreement with Hong Kong,” CO129\_521\_15 file, 1–151.

27 “Mission of Sir F. Leith–Ross to China: proposals for a Hong Kong–China Customs Union,” CO129\_558\_11 files, 1–127.

而，當 1937 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1938 年廣州淪陷，這些建議亦無疾而終。雖然 1938 年廣州淪陷，但根據 CO129/574 和 CO129/585/9 的檔案資料，自 1938 年至 1940 年，位於香港隸屬於中國海關的九龍關仍然運作，可見香港對於中國海關在 1937 年以後的重要性。<sup>28</sup>

誠然，研究人員相信上述的資料只為香港海關史料的冰山一角。關於香港海關和昔日同屬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海關、由英國人主導的中國內地海關、英國本土的海關，在事務上的聯絡均可以多作比較，並需要更多學者往英國政府檔案館和中國內地各省市檔案館，進行資料尋訪工作。另外，香港作為二次大戰前中外海上貿易的重鎮，出入口稅收為中國和外國轉運貿易總額的一半，研究人員相信不少航運公司的檔案資料，如招商局檔案（見中國蛇口招商局檔案館）、半島東方輪船公司檔案（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見英國倫敦國家海事博物館），均可以幫助學者從航運史的角度了解香港在整個亞洲地區的海關和海運網絡的角色和作用，若要了解五、六十年代以後香港海關的發展，有必要進行大量口述歷史的工作，與文獻檔案互相引證。最後，在香港警隊博物館、香港懲教博物館之外，希望香港擁有一所以香港海關歷史為主題的博物館，使更多市民了解香港海關對香港與國際貿易、本地和內地治安及發展的貢獻！

---

28 Collection of Chinese customs in Hong Kong,” CO129\_574\_14 files, 1–23; “Chinese customs stations in Hong Kong,” CO129\_585\_9 files, 1–59.

❖ 讀書札記 ❖

## 才女和女四書 ——讀黃嫣梨《女四書集注義證》

黃季耕  
安徽省教育學會

去年，在驕陽似火的盛夏的一個響午，我接到香港文藝家協會主席、著名詩人王一桃寄來一本沉甸甸的深紅色燙金書封，由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的《女四書集注義證》，著者黃嫣梨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打開書頁，真是書香撲鼻。一桃要我寫篇文章，我欣然應命。雖因故耽擱一些時日，但終於寫出讀書隨筆，下面且將著者身世和女四書精要分別列敘。

班昭，字惠姬，博學高才，滿腹經綸。她不僅精通文史，對天文、地理也多有涉獵，繼其兄班固《漢書》未竟之業，續作「八表」和「天文志」。在文章方面多體兼擅，她的《東征賦》、《大雀賦》、《針縷賦》，及《為兄超求代疏》等，傳誦一時，由於她學識淵博，才華橫溢，深得帝后賞識。因嫁往曹姓，召進宮後，被尊稱為曹大家（gu）。外國進奉珍寶，皇帝常詔她寫賦作頌。並在鄧太后臨朝時參與政事。太后兄鄧騭因母喪上書求退，太后跟班昭商量，她直言贊成請辭。這樣，既可成全其兄謙讓的美德，又可避免外戚擅權的隱憂，可見她具有深謀遠慮的卓見。當班昭在 70 多歲高齡辭世，朝野上下，一片哀泣，鄧太后還為她素服舉喪。

班昭的《女誡》共七篇，即〈卑弱〉、〈夫婦〉、〈敬慎〉、〈婦行〉、〈專心〉、〈曲從〉、〈和叔妹〉等作為內誡，主要是教導女子出嫁後要當個好媳婦。正如《義證》著者的概括：全篇貫串著「以柔締造和諧的局面。」特別是「婦行」所提出的「婦敬」、「婦言」、「婦容」、「婦功」，從婦女的德、行、言、貌全方位規範女子的行為，對後世很有影響。書中把「卑弱」列於首章，表明女才人也無法改變當時男尊女卑的倫理觀。書中所說的「卑弱」和「曲從」，「義證」著者，換個視角，把它理解為「容忍」、「接納」和「互讓互諒」，便在現代生活中找到新的契合點。「敬慎」章所說：「敬謂持久，順謂寬裕」。丈夫有忿言責語，妻子能以「禮」相待，寬懷相容，就不致因忤慢乃至凌辱而出現「恩義俱廢」，甚至鬧到離散的地步。夫婦間應注重「宏義」和「大節」，能以「賢」相待相助，便可營造一個和諧幸福的家。這些警戒的話，至今仍值得借鑒。

《女論語》的作者宋若莘，若昭姐妹，是唐代有名的女學士和宮內總管。父親宋廷芬，世為儒學。姐妹四人，都聰慧過人，從小就習經藝，學詩文，都善詩能文，而大姐若莘、二姐若昭才華更顯。兩姐妹文章「淡麗」，性情也「貞素閑雅」，藝學才名更為親朋稱道。

唐貞元四年（788 年）昭義節度使李抱真非常賞識二人的才華，向德宗推薦，被召入禁中，講經史大義，乃至在群臣賦詩酬作時，姐妹倆侍奉在側，可以隨時應對，還常獲賞賜。由於敬重姐妹倆的品格，並尊稱為學士先生。穆宗時若莘辭世，若昭代理其職，拜為「尚宮」。穆宗、敬宗都呼為先生，六宮嬪妃、尚宮皇子、公主、駙馬都稱她為師，後被封為梁國夫人，姐妹倆由於特殊識見和個性，「誓不從人」，終身未嫁。

若莘姐妹所著《女論語》，不僅反映她倆的家庭倫理觀，還顯示了唐代中葉的女性思維。才女得到社會尊重和賞識，還可以著書立說，參與政事，鑒於歷代對儒家倫理綱常的尊從，書的「序傳」提出只要女子做到貞德完善，志操純一，就可稱為賢婦，乃至美名傳千古。全書從立身、學作、學禮、事父母到營家、待客、和樂、守節共九章。全篇多托曹大家之言，教示庶民女子。首章要求女子「立身」要以端正為本。次章「學作」教示婦女以勤勞節儉為務，「勤則家富，奢則家貧」彰顯勤儉美德。「事夫」章指出：「夫剛妻柔，恩愛相因。居家相待，敬重如賓。」妻要做到「同甘共苦，同富同貧。」丈夫在生氣，可以相讓，但「夫有惡事」，應「勸諫諄諄」，不要導致「惹禍臨身」。在「和樂」章中，更希望婦女「以和為貴，孝順為尊。」要善待鄰里，不要閑非入門。更不要「穢言污語，觸突尊賢」。事實證明，一個個家的基石穩固、幸福，社會才得以繁榮昌盛。

仁孝文皇后徐氏，是開國勳臣中山武寧王之女。她好讀書，天資又特別聰慧，博聞強識，在功臣兒女中，有「女諸生」之稱。她先被冊封為燕后，對高皇后馬氏在世時侍奉有加，逝世後對其遺言舉之不遺。1402 年，朱棣即位，改元永樂，徐氏被封皇后，除侍奉成祖外，還為治國安邦獻策，常勸成祖施行仁政，與民休息。還建言「廣求賢才，恩禮宗室」，不驕畜外家。特別是在「靖難」之初，朱棣出征，徐皇后與朱高熾居守北平。官軍攻城緊急，她挺身而出，組織將校士民的妻子披掛上陣，親自督戰，激勵士氣，登城拒守，為保住城池，立下了大功，可見她有才有勇。徐皇后著有《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文皇后詩》、《貞列事實》、《北溪字義》和佛學著作三部。

徐皇后的《內訓》，成於永樂三年，是明代很重要的女教讀本。此書主要記述慈孝皇后垂訓，從〈德性〉、〈修身〉、〈勤勵〉、〈節儉〉，到〈警戒〉、〈積善〉、〈睦親〉等共 20 章。訓示的內容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她把女教與國家的穩定和王朝的興衰緊密聯繫，更是這位女皇后的宏識和遠見。「修身」篇說：「身不修則德不立，德不立則不能成化於家」。家的隆替，國的興廢，靠的是修身立德。而寧心定志，做到守仁厚，持莊嚴，執信義，就會「讒慝不作」，從而使家雍容和睦，乃至「言齊國安」，所以必須「言必有德」。再有「國家世積厚德」，士庶人妻子又有積善內助之美，當然會使家和國興。徐皇后還「縱觀往古國家興廢，未有不由於婦之賢否」，因女寵而政荒，委實千古堪戒。特別是徐皇后立於仁愛高度，「仁恕寬厚」，「不忘小善，不記小過」，認為只有「讒慝息，則親愛全；親愛全，則恩義備。」這樣由內和而外和，「一家和而一國和，一國和而天下和矣。」徐皇后以此胸懷，高揚由家國和而至舉世和諧之音，是會留聲千古的。

《女範捷錄》作者劉氏，明代王集敬的妻子。她識字早，廣習詩文，據兒子王相介紹「幼善屬文，」可見亦是才女。她三十歲時，丈夫去世，守節六十年，活到九十歲。曾著有《古今女鑒》（未存）及《女範捷錄》，該書有總論、后德、母儀及智慧、勤儉、才德等十一篇。《捷錄》在總論中提出：「修身者齊家之要，立教者明倫之本。」對男子來說可以尊師取友，而女子無專門學習之所，只有以古為師。這本女教書的特點是大量列舉古人事例，特別重視女子

的才德和智慧。如她所說：「有智夫人，勝於男子。」漢代樂羊子，聽妻子勸諫，益志苦學，多年未歸，終於學成而名顯。而明太祖五氏孫寧王宸濠想謀反，妻子一再勸說不要叛國，就是不聽，結果被擒，深悔未聽婦言而亡。魯漆室處女，不紡織而歎息，憂的是國禍民辱，足見婦女的智慧過人。在「才德」篇中，王節婦說：「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殊非。」敢非習用之語，實是才智過人。她說：「有才者必貴乎有德」。如唐太宗淑妃徐惠，勸諫皇上不要窮兵伐遠，耗費國力，帝聽勸而止，避免一場災難。柳下惠的妻子，對丈夫「憂國救亂」，三次罷免而不離去，妻子親為累贊而彰顯。齊陶答子治陶，富貴返鄉，妻子知道他由貪而富，必然敗亡，願與子離家，被姑棄逐。一年後陶家被盜，僅老母免害，妻子又返家養姑，直到高壽而終。上述事例證明：女子懷家憂國，才德俱全，不僅是巾幗不讓鬚眉，而是高才智女子勝過男人。

以上四位才女的女教書，展示的貞靜，謙和與柔美的操守，勤勞、節儉和才智的德行，不僅顯示女子的智慧和才華，而且成爲優秀的女教書，也成爲建立和諧社會和家庭的一面閃光的古鏡。馮梨教授亦是才女，她撰著《中國婦女研究論集》，還爲宋代女詞人及清代多位女詞人作傳。爲了對《女四書集注》作義證，她用新的視角品評。馮梨教授披沙撿金，爬梳剔抉，對沒有「作點注腳的，事典的來龍去脈始終闕如的」，她精心地查找史傳和典籍，找出原委和出處，在繁重教學和科研任務擠壓下，花了七年時間完成此著，她不愧是《女四書》的功臣。這本集眾才女瀝心瀝血撰寫和釋評之作，宣揚了優秀的傳統文化，彰顯了女才人的才德智慧的大著，是一本值得勤學者捧讀的好書。

❖ 書 評 ❖

## 何方昱著《科學時代的人文主義：〈思想與時代〉月刊（1941-1948）研究》

書 名：《科學時代的人文主義：〈思想與時代〉月刊（1941-1948）研究》

著 者：何方昱

出 版 地：上海

出 版 社：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8

頁 數：367

出版史研究學者王建輝表示，「近代報刊的出現，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一個有力的工具，是近代知識分子智力的體現，是中國文化向近代演變的一個歷史性的標誌，也是近代中國文化的重要內容。」<sup>1</sup> 王氏所指的「報刊」，是報紙與雜誌的合稱。既然雜誌在推動近代中國歷史前進、促進中國文化演變方面發揮重大作用，因此吸引學者對在近代中國時候出版的雜誌進行探討。何方昱《「科學時代的人文主義」：《思想與時代》月刊（1941-1948）研究》一書就是對在 1941 至 1948 年出版的《思想與時代》作出研究。

該書是在作者的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的。內容方面，除〈緒論〉、〈結語〉外，還有六章。〈緒論〉說明研究原因、研究對象、研究目的與探討範圍。同時回顧關於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雜誌刊物、學術機構團體，以及抗戰時中國文化史研究成果，藉以揭示《思想與時代》的研究情況。此外，亦交代研究材料，簡介各章內容。

第一章〈學人、媒介與國家〉指出張其昀與張蔭麟是《思想與時代》的創辦人，分析二人創辦該誌的原因，並且將該誌與同時期出版的學術刊物，如唐君毅創辦的《理想與文化》、牟宗三創辦的《歷史與文化》進行比較，闡析《思想與時代》較其他同類刊物出版壽命長的原因。第二章〈學人、學社與學術〉介紹《思想與時代》主編、作者群、內容主題，還有該誌的專刊與叢刊。主編方面，包括：張蔭麟、謝幼偉、郭斌蘇、張其昀。同時表示除主編外，錢穆、賀麟、朱光潛也是該誌的重要成員。作者群方面，統計雜誌撰稿人數目，說明他們的教育、職業背景。內容主題方面，作者通過對雜誌內文章進行統計與分類，認為「文化思想類文章數量最多，科學新知類亦佔相當比重。」（頁 114-115）其中有關文化思想類文章，當中不少是探討中西文化與哲學的。對於《思想與時代》的專刊與叢刊，則解釋它們的出版動

---

1 王建輝：〈知識分子群體與近代報刊〉，氏著：《出版與近代文明》（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 97。

機，並介紹兩者的內容。

既然《思想與時代》重視文化與科學，因此書中第三章、第四章剖析該誌作者對文化、科學的看法。第三章〈融貫新舊〉首先探討雜誌成員對儒家學術與文化的想法。作者根據朱光潛、賀麟、謝幼偉與郭斌蘇四人對儒家禮樂精神、儒家思想、中國孝文化的研究，顯示該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就是「對於中國固有文化及儒家學術亦抱有肯定態度。」（頁 144）此外，著者亦利用張蔭麟、錢穆、黃尊生、賀麟、郭斌蘇，以及謝幼偉各人的文章，了解他們對關於中西文化諸問題，如中西方科學差距、西方工業革命、西方文化優缺點、中國如何學習西方等的意見。

第四章〈溝通文質〉「以《思想與時代》月刊撰稿人中科學家學人群的言說為中心，著力於考察 1940 年代中國學界的科學認知，祈能闡明此一時期學人溝通科學與人文的路徑，及至思想與時代的互動。」（頁 182）所謂「科學家學人群」，包括：竺可楨、盧于道、陳立、洪謙、錢寶琮與張其昀。為達致本章撰寫目的，作者集中闡析他們在科學與哲學的關係、科學與社會的關係、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的關係各方面的見解。與此同時，作者也提到國民政府、科玄之爭參與者、一九三零年代的本土文化派和全盤西化派，將他們與這班科學家學人群互相比較。

《思想與時代》不少作者是在大學任教，他們在雜誌上發表文章，表達個人在教育上的見解。第五章〈為通才教育作先路之導〉探討錢穆的大學通才教育理念、郭斌蘇與謝幼偉的西哲通才教育思想研究，兼且論述張其昀等人在通才教育上的實踐。對於他們實踐表現的研究原因，作者解釋「體現《思想與時代》月刊社同人通才教育觀在實踐層面的具體操作及實施過程，以展示其教育觀不僅體現在學理的層面，更在實踐中有所作為，彰顯刊物同人於刊物背後的多重身份。」（頁 251）

除文化、科學、教育外，政治亦是《思想與時代》作者熱衷討論的課題。第六章〈為現代民治厚植其基礎〉闡析張其昀、錢穆、朱光潛、郭斌蘇，還有其他作者如賀昌群、陳之邁在多項政治問題的主張，這些問題包括：建都問題、孫中山五權憲法、政治與教育及哲學關係、政治家的風度，以及法治如何實踐。著者又論述陳之邁、張其昀、錢穆三人與國民政府的關係。透過雜誌作者的政治言論或表現，本書作者指出一九四零年代學術與政治關係，一方面是「國民黨需要憑藉一份學界刊物在彼時中國思想界造成一種他們所期望的影響力」（頁 273），另一方面是「《思想與時代》社同人對於政治的關注，希冀通過學術的力量影響政治。」（頁 274）

最後，〈結語：失蹤的刊物？——《思想與時代》月刊的歷史定位〉闡明該誌的時代意義、媒介意義、學術及思想意義。還有將該誌與《學衡》、《觀察》兩份刊物作出比較。通過《思想與時代》與《學衡》比較，糾正《思想與時代》是《學衡》延續的說法。至於《思想與時代》與《觀察》關係方面，在抨擊政府的表現上，《思想與時代》較《觀察》遜色。作者進而分析《思想與時代》對當時國內政治影響不大的原因。書末有〈附錄：《思想與時代》月刊目錄（1941-1948）〉、〈徵引文獻〉和〈後記〉。

《思想與時代》曾經刊載若干新儒學學者作品，如賀麟〈儒家思想的新開展〉、〈自然與人生〉；錢穆〈東西接觸與中國文化之新趨向〉、〈中國近代儒學之趨勢〉等。此外，馮友蘭貞元六書之一《新原人》，書中文章最初在《思想與時代》刊登。其中賀麟、馮友蘭二人的著作被視為宣揚新儒學的重要作品。由於刊登這些文章，《思想與時代》因而受到學者注意，對該

誌與近代中國文化發展關係展開探討，認為該誌是抗戰時期文化保守思潮的主要代表，而且在推動新儒學發展上發揮了積極作用。《「科學時代的人文主義」：〈思想與時代〉月刊（1941–1948）研究》一書也關注該誌作者的中西文化觀。與此同時，本書作者又留意雜誌作者對科學、教育、政治的看法，對他們的看法進行闡析，它擴充了我們對《思想與時代》內容的認識，使《思想與時代》的研究向前邁進。

書中有不少圖表，部分圖表如「《思想與時代》月刊作者統計表」、「《思想與時代》月刊作者群國內教育背景統計」、「《思想與時代》月刊作者群國外教育背景統計」、「《思想與時代》月刊內容之分類」、「《思想與時代》月刊各主編時期刊物內容分類統計」，製作時不僅需要翻閱各期《思想與時代》月刊，兼且要參考與該誌作者相關的多項資料，可見作者製作這些圖表，花費了不少時間與精力，作者這番苦功值得我們嘉獎。

不過，書中一些論述略欠準確。作者論述《思想與時代》的發展時，提到文學家夏承燾，指出「夏氏原在上海之江大學任教，1942年11月末赴浙江大學龍泉分校任教。」（頁110）之江大學是基督教大學，在杭州創辦，抗戰初期遷至上海，與滬江大學等教會學校合辦華東聯合大學。<sup>2</sup> 因此夏承燾應該在華東聯合大學執教，而作者稱夏氏任教於上海之江大學是稍欠準確的。該書第五章探討《思想與時代》作者的教育觀時，作者表示「自1905年科舉制的廢除，儒家的傳統教育宣告終結。」（頁213）私塾是中國傳統教育中的重要部分，它在民國時期依然存在。根據史學家王德昭教授（1914–1982）夫人陳琬回憶，王德昭小時候曾在私塾學習。<sup>3</sup> 有學者對民國時期私塾發展進行研究，指出當時私塾仍然存在，不過情況每況愈下，而私塾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才完全消失。（詳參蔣純焦：《一個階層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師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由此可見，與其作者稱「儒家的傳統教育宣告終結」，不如改寫為「儒家的傳統教育發展式微」，它更能真實地說明中國教育的實況！

此外，在本書第三章中，作者剖析黃尊生〈談西洋文明〉一文，提及黃尊生對西方文明是動、東方文明是靜這個見解的意見。其實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期，杜亞泉在《東方雜誌》上發表〈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並且與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展開了文化論戰。（詳參范永聰：〈杜亞泉的文化思想與東西文化論戰〉，胡春惠、周惠民編：《兩岸三地歷史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論文集》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台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1年，頁131–157。）若作者能夠對陳獨秀、杜亞泉這場文化論戰稍作交代，可以使讀者了解黃尊生〈談西洋文明〉一文的寫作背景，並且增進認識民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在中西文化的探索歷程。最後，書中有一些錯別字，如「Yound-Tsu Wong」（頁26）、「顧劫剛」（頁93）、「王明明」（頁208）、「達到孔家店」（頁214），應該是「Young-Tsu Wong」、「顧頴剛」、「王陽明」、「打倒孔家店」。

文兆堅（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

2 吳梓明、梁元生、李金強編：《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第一輯：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綜覽》（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1998年），頁148–149。

3 陳琬：〈王德昭教授之生平事略〉，《王德昭教授史學論集》編輯委員會編：《王德昭教授史學論集》（香港：《王德昭教授史學論集》編輯委員會，1985年），頁8。

❖ 書 評 ❖

## 葉嘉熾著《民國時期的健康和國家重建： 1928-1937 年間現代健康服務的發展》

書 名：*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 1928-1937*

著 者：Yip Ka Che

出 版 地：Ann Arbor, Michigan

出 版 社：Association for Asia Studies

出版年份：1995

頁 數：289

全書共分七章，作者葉嘉熾指出本書的寫成是源自他對民國時期幾個傑出醫師的研究，當他的研究層層深入，就發覺以往的學者都忽略了民國時期中國健康服務發展的歷史，所以決定進行較深入的研究，並寫成本書。在 1928-1937 年間，中國經歷了她的歷史上一段最動盪的時期，雖然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皇朝，成立中華民國，但中國人民隨即又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國內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國外面臨被列強瓜分的威脅，尤其是日本對中國虎視眈眈。國民政府雖然未能處理人口膨脹、廣泛貧窮、文盲率高、農民不滿和交通不便等問題，但國民教育和國民健康卻得到發展，這是因為早在 1919 年五四運動發生後，知識份子已高呼「民主」和科學，有知識才能爭取民主，而醫學的進步又和科學的進步相呼應，加上國民政府得到外國的幫助，大力推動國民教育和國民健康服務，所以令教育和醫學都得到長足的發展。

第一章〈民國初期的保健事業〉講述中國人逐漸接受西方醫學的經過。民初時期中國的衛生情況非常惡劣，每年在 1,000 人之中就有 25 至 30 人因疾病而死亡，而同時期英國和日本在 1,000 人之中分別只有 12 和 18 人因疾病而死亡。當時中國人的衛生意識非常缺乏，隨街傾倒垃圾和排泄物，令細菌和蚊蟲滋生，人和禽畜同住，令疾病更容易在人畜之間傳播，最終導致鼠疫的大規模爆發。西方醫藥對於鼠疫疫情的控制有非常之大的貢獻，瑞士細菌學家亞歷山大耶爾辛更研製出鼠疫桿菌血清和疫苗，令中國人對西方醫學改觀。西方傳教士將西方醫學引入中國，西人醫生在中國推動西方醫學教育，並成功控制中國的鼠疫，而美國洛克菲勒基金（American Rockefeller Foundation）則於 1914 年成立中國醫學委員會（China Medical Board），在中國推行西方醫學的教育事業，又於 1915 年接管北京協和醫學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使之成為能與歐美媲美的世界一級醫學學府。所以，西方傳教士、西人醫生和美國洛克菲勒基金在對於民國初期中國的保健事業實有不能磨滅的巨大貢獻。

第二章〈健康重建和國家重建〉講述國民健康的改善和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1928年10月30日中國衛生部（Ministry of Health）成立，國民政府指出一個國家的衛生質素與民族的繁榮是緊密相關的，如果一個國家的衛生情況非常差，那她就無法繁榮起來，國民要有強健的體魄才能令民族強盛。所以，國民政府推動醫學現代化，將藥物納入國家管制之下，由北京協和醫學院負責。嚴復、康有為、梁啟超、陳獨秀和魯迅等提倡民族自強，令中國能夠在達爾文主義盛行，弱肉強食的世界中生存。為了重建國家，恢復社會的秩序，國民政府在行政、立法、教育、經濟和外交的改善上都作出了努力，更在1928年將「行政」、「立法」、「司法」、「警察」和「考試」五權分立，令政府的運作更具系統。

第三章〈健康服務的組織和運作〉講述衛生部（Ministry of Health）的成立經過和運作。美國洛克菲勒基金（American Rockefeller Foundation）和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在衛生部成立的過程中都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書中有詳細的敘述。衛生部於1928年成立，主要由兩個顧問董事會和五個行政部門組成，轄下還有一些特別委員會，負責執行各種衛生工作。

第四章〈農村健康服務的發展和組織〉講述國民政府將健康服務引入農村的工作。中國的人口在二十世紀初有四億五千萬，其中超過80%的人生活在農村，農民的居住環境非常簡陋，而且缺乏衛生意識，以人和禽畜的糞便作為肥料，貯存這些糞便的地方就成為病菌滋生的溫床，1931年的鼠疫和1934年的霍亂爆發都是源於農村。農村醫療物資缺乏，農民遇到生病和受傷的情況就要遠到城市求醫，但由於交通不便，有時可能會因延誤救治而死亡。農民收入低，但醫療支出卻佔年收入75%。農婦於分娩時只能靠穩婆接生，產婦有可能難產死亡，而嬰兒亦有可能因出生的過程不順利而死亡。農村嬰兒的夭折率非常高，每1,000個出生的嬰兒就有164個夭折。為了解決以上的情況，國民政府在農村鋪設道路，引入機器耕種，興建水壩，改善農村水浸的情況，又設置健康中心，向農民灌輸健康和衛生意識，其中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大力的贊助。一些傳教士和西人醫生更自發深入偏遠的農村，為農民提供教育和醫療服務。

第五章〈公共衛生系統的發展〉講述建立公共衛生的工作。為了建立起一個現代的公共衛生系統，國民政府在預防和控制傳染疾病、提升國民生活水準、延長國民壽命、改善環境衛生和提供醫療服務的工作上都作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又制定工廠衛生設備的標準，建立統計出生和死亡人數的系統，頒布檢疫和隔離的條例，提供母嬰健康服務，並在學校推行健康教育和舉行清潔運動。

第六章〈醫療人員的訓練和供應〉講述各醫科學府對學生的訓練，為社會提供從事醫療工作的人力，包括衛生官員和行政人員、醫生、牙醫、藥劑師、護士和助產士等。根據1929年的統計，全中國有4,000至5,000個在西式醫學院畢業的醫生，其中只有918人有向衛生部註冊，當時中國人口四億五千萬，醫生與病人的比率是1:90,000-112,500，與美國的1:800和英國的1:1,490相比，中國的醫療人手嚴重缺乏。為了要在10年內達到1:8,000的目標，每年就要出訓練5,000個醫科畢業生，中國最高醫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John Hopkins School of Medicine）的課程標準，帶領著全國的醫學院，強調「質」

「量」並重，為達到這目標而努力。

第七章〈序幕〉講述日本侵華並未令國民政府的保健事業中斷，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更開始了新階段的保健事業。日本在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但未被日本佔領的中國領土仍能繼續進行各種醫療計劃，各醫學院仍能繼續運作。由於甘肅和西北地區是戰略重

地，國民政府於 1941 年在蘭州成立西北醫院（Northwest Hospital），作為全國醫療中心。在 1937–41 年間，甘肅、貴州、雲南和四川的醫療中心數目大大增加，其中雲南在 1937 年只有 3 個醫療中心，到 1941 年已增加至 77 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協助國民政府進行各種醫療重建工作，其後國共內戰爆發，共產黨獲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共產黨領導人積極推行現代化運動，並強調國民體魄的強健與否影響到民族的生存。

書末列出位於北平、上海、南京、廣東、開封、保定、杭州、南昌、濟南、昆明、蘭州、成都、瀋陽、長沙、南通、江蘇和太原的 28 間公私立醫學院的名稱，並附有中英文詞彙對照和重要名詞索引。總的來說，葉嘉熾利用順時序的方法清楚地敘述由 1928–1937 年國民政府的醫療事業，更在最後一章交代中國醫療事業在戰後的發展，其中第四章〈農村健康服務的發展和組織〉尤為值得注意，揭露了農村醫療設備缺乏的實況，雖然國民政府、洛克菲勒基金、傳教士和西人醫生都為改善農村醫療服務作出了努力，但中國現代醫學之父伍連德估計，直至 1937 年，即使在發展程度較高的農村，仍然有超過 65% 的農民用草藥和符水治病，26% 更完全未獲任何治療而死亡。在今日的中國，這情況仍然存在，改善的需要實在迫切。

廖懷恩（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 書 評 ❖

## 《鼠疫、沙士和香港醫學的故事》

書 名：*Plague, SARS and the story of Medicine in Hong Kong*

編 者：Arthur Starling, Faith C. S. Ho, Lilian Luke, Tso Shiu Chiu, Ediwin C. L. Yu

出版地：Hong Kong

出版社：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年份：2006

頁 數：368

本書題為《鼠疫、沙士和香港醫學的故事》，是爲了紀念香港醫學博物館成立 10 週年及其前身香港細菌學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易名爲病理學院）建立 100 週年而出版的。香港曾經是世界上衛生情況最差的地方之一，後來成功變成一個衛生城市，戰勝了各種傳染病，說明了一個城市的大小和資源並不是限制。引致鼠疫的鼠疫桿菌於 1894 年在香港被發現，差不多 110 年之後，科學家於 2003 年在香港找出引致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簡稱 SARS）的冠狀病毒。此外，H3N2 和 H5N1 流感也是在香港被成功從人體之中離析出來。本書共有六章，紀錄了香港由 1841 年至 2005 年初的醫學發展。

第一章〈香港傳染病的歷史：發現和挑戰的故事〉，將香港傳染病的歷史分爲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 1841–1941 年，這時期的傳染病有：香港熱（Hong Kong Fever）、瘧疾（Malaria）、天花（Smallpox）和鼠疫（Plague）；第二個時期是 1945 年至 1960 年代，這時期的傳染病有：霍亂（Cholera）、肺結核（Tuberculosis）、小兒麻痺症（Poliomyelitis）、白喉（Diphtheria）和麻疹（Measles）；第三個時期是 1960 年代至 1997 年，這時期的傳染病有：香港流感（Hong Kong Flu）、乙型肝炎（Viral Hepatitis B）和愛滋病（AIDS）；第四個時期是 1997–2005 年，這時期的傳染病有：禽流感（Avian Influenza）和沙士（SARS）。

第二章〈香港醫院的發展〉，附有全港 42 間公立醫院的所在位置圖，並特別詳細介紹了傳道會醫院（The Medical Missionary Hospital of Hong Kong, 1843–53 年）、海員醫院（The Seamen's Hospital, 1843–73 年）、政府公立醫院（The Government Civil Hospital, 1849–1937 年）、駱克醫院（The Lock Hospital, 1858–94 年）的歷史，及現存的東華醫院（Tung Wah Hospital, 1872 年成立）、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Alice Ho Miu Ling Nethersole Hospital, 1887 年成立）、贊育醫院（Tsan Yuk Hospital, 1922 年成立）、九龍醫院（Kowloon Hospital, 1925 年成立）、瑪麗醫院（Queen Mary Hospital, 1937 年成立）、伊利沙伯醫院（Queen Elizabeth Hospital, 1963 年成立）、基督教聯合醫院（United Christian Hospital, 1973 年成立）、威爾斯親王醫院（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1984 年成立）、明德國際醫院（Matilda International Hospital, 1907 年成立）、

養和醫院(Hong Kong Sanatorium and Hospital, 1922 年成立)和青山醫院(Castle Peak Hospital, 1961 年成立)的歷史和近況。

第三章〈細菌學院及其對香港的貢獻〉，交代了 1894 年鼠疫爆發是細菌學院(Bacteriological Institute)成立的背景，收錄了太平山重建法令(The Tai Ping Shan Resumption Ordinance)，比較了香港和馬來西亞的細菌學研究發展，介紹了香港細菌學院的興建、內部設備和研究工作。細菌學院負責生產天花病毒、鼠疫桿菌、腦膜炎雙球菌、肺炎雙球菌、霍亂弧菌、傷寒桿菌和狂犬病毒疫苗，所以在香港防疫史上實有巨大的貢獻。在日軍佔領香港期間(1942–45 年)，細菌學院被日軍接管，只能繼續進行有限度的研究工作。大戰結束後，細菌學院改名為病理學院(Pathological Institute)，重新恢復運作，更負責進行預防肺結核的卡介苗接種計劃。1995 年，病理學院被改建成為香港醫學博物館，於 1996 年 3 月 16 日正式開放給市民參觀。

第四章〈香港對肺結核的抗爭〉，政府積極進行健康教育，並為初生嬰兒和小學生接種卡介苗。一些非政府機構，例如香港防癆會(The Hong Kong Anti-Tuberculosis Association)、靈實療養院(Haven of Hope Sanatorium)、東華三院(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和黃大仙療養院(The Wong Tai Sin Infirmary)等亦為肺結核病人提供服務。此外，本章詳細介紹了卡介苗的預防接種、特別的化學療法、海外專家的援助和有關肺結核的研究工作。

第五章〈社會的保健事業〉，首先介紹傳統的中國醫學，然後交代西方醫學傳入香港的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政府積極推行的醫療保健和家庭計劃，並為精神病人提供照顧和治療，擴大和專門化有關精神病的服務，推行精神健康教育，社會公眾對精神病人的觀念亦有所改變。此外，輸血方法、動物組織移植、器官移植、骨髓移植、角膜移植和腎臟移植技術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引入香港。

第六章〈醫學教育的發展〉，敘述了香港醫學教育的歷史和近期香港醫學教育的發展，並交代了香港醫學專科學院(The Hong Kong Academy of Medicine)成立的過程。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是一所獨立的法定機構，有權組織、監察及評核所有醫學專科訓練，並頒授有關資格，同時亦負責提供延續醫學教育，成立的目的是為了滿足社會對於大學以上程度醫學教育和培訓的需求，學院成立的宗旨是促進醫學技術的發展，鼓勵延續醫學教育，提高專業及執業操守與專科執業水準，促進和改善香港市民健康護理，提升執業醫生之間的合作精神，以及促進醫學資訊及意見交流。

書末有 1841–2006 年香港醫療大事年表和中英文參考書目。附錄 2002 年香港頭十種致命疾病、1981–2004 年間香港中文大學醫科學生的入學和畢業人數表、1912–2004 年間香港大學醫科學生的入學和畢業人數表。

廖懷恩(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 學界動向 ❖

## 浸大歷史系 2010 年夏季活動報導

### ■ 孫中山思想研討會

由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香港中山學會及中華港澳之友協會主辦的「中山思想現代化對當前兩岸四地政經關係的影響」研討會，2010年5月8日在香港浸會大學逸夫行政樓五樓會議廳舉行。宣讀論文計有：陳蘊茜（南京大學）「孫中山符號在台灣傳播與意義轉化」、邵宗海（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先生與民族主義思想」、周佳榮（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網絡與亞洲視角——孫中山思想的當代意義」、曹俊漢（中國文化大學）「全球化下中山思想發展與新思維：對國家角色的詮釋」、李金強（香港浸會大學）「兩岸關係發展及中山思想的啓迪」、龐建國（中國文化大學）「中山思想與中國模式」。同日下午舉行圓桌論壇，主題是「兩岸關係新格局下香港中介角色的挑戰與前瞻」。

### ■ 孫中山先生專題演講

香港浸會大學於2010年6月11日舉辦「孫中山先生專題演講」，由該校歷史系三位教授擔任講者，包括林啓彥教授講「孫中山與日本」、周佳榮教授講「孫中山的視覺形象」及李金強教授講「啓蒙明燈在上環——孫中山與香港」。會後另有孫中山先生銅像揭幕儀式，主禮嘉賓有孫穗芳博士及浸大校長吳清輝教授、歷史系系主任麥勁生教授、校牧葉敬德博士。

### ■ 香港史學名家講座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與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於2010年6月18日合辦「香港史學名家講座」，邀請兩位主講嘉賓：林啓彥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講「與史有緣」，張偉國教授（香港公開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講「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與我」。講座在香港浸會大學逸夫行政樓（SWT501室）舉行。

### ■ 亞洲港口疾病與公共衛生研討會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及近代史研究中心主辦的「亞洲港口疾病與公共衛生（1850年代—1950年代）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年6月24至25日在該校逸夫行政樓501室舉行。首日活動為開幕典禮及宣讀論文，共有四組討論；次日上午活動為第五、六組討論及大會總結，宣讀論文共有十八篇。同日下午舉行「東亞醫療歷史工作坊」，由葉嘉熾教授（馬里蘭大學）主持，講者包括周佳榮教授（香港浸會大學）、胡成教授（南京大學）、蘇精教授（國立清華大學）、飯島涉教授（青山學院大學）和余新忠教授（南開大學）。

## ■ 浸會大學史學公開講座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邀請日本京都大學貴志俊彥教授於 2010 年 7 月 5 日及 6 日作出兩次公開講座，講題是「東亞・東南亞媒體文化中的太平洋戰爭及戰後的記憶與記錄」和「援引非文字資料的歷史研究新方法——中國滿洲的視覺媒體和 SP 唱片」。講座在逸夫行政樓(SWT 501 室)舉行。

## ■ 2010 年夏季歷史講堂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三聯書店及中華書局合辦的歷史講堂，續於 2010 年 5 月至 8 月在香港中環三聯書店樓上創 Bookcafe 舉行四次演講，詳情如下：

- ◆ 5 月 8 日，張偉國博士（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主講「話說秦皇漢武」。
- ◆ 6 月 12 日，區志堅博士（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助理課程總監）主講「百年樹人——談談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 ◆ 7 月 10 日，周佳榮教授（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及侯勵英博士（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講師）主講「華商會所・中總・廠商會——中環的商業網絡與社區文化」。
- ◆ 8 月 14 日，丁新豹博士（香港歷史博物館名譽顧問）主講「共度時艱：日佔時期的香港東華三院」。

歷史講堂自 2005 年創立以來，五年間總共舉辦了 60 次活動，每次參加者都很踴躍，由數十人至二百人不等，甚獲好評，至此宣佈圓滿結束。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 學界動向 ❖

## 「歷史講堂」五週年特刊

### 一、「歷史講堂」五年來活動概覽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中華書局、三聯書店合辦的「歷史講堂」，自2005年5月開始以來，每月舉行一次，時間是星期六下午二時半至四時半，地點在香港中環三聯書店樓上的創BOOKCAFE，五年來總共舉辦了五十九次講座。歷次的活動情況如下：

	講 題	講 者	日期 / 主持
第 1 講	水滸群英會	何冠環（香港理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署理主任及高級講師）	2005年5月7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第 2 講	從中國版圖變遷看歷史	張偉國（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2005年6月25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第 3 講	從漫畫到動畫——創意文化產業在香港的發展及其前瞻	周佳榮（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	2005年7月30日 區志堅博士主持
第 4 講	當代中東政局與兩次世界大戰	沈旭暉（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博士候選人）	2005年8月27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第 5 講	香港粵語流行文化的黃金歲月	鍾寶賢（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2005年10月15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第 6 講	孫中山與香港——以皇仁書院作為考察	李金強（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2005年11月12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第 7 講	認識日本——從德川時期至近現代的進程	趙雨樂（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2005年12月10日 王章偉博士主持
第 8 講	粵港黃大仙信仰的再認識（1890—1930）	游子安（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 鍾潔雄（資深出版人）、 危丁明（資深編輯）	2006年2月11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第 9 講	中國歷史上的瘟疫與社會	范家偉（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導師）	2006年3月4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第 10 講	中國與西方歷史上的巫覡與巫術	王章偉（《香港社會科學學報》副編輯）	2006年4月1日 羅金義博士主持

第 11 講	納粹黨的興起與新納粹主義	麥勁生（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2006 年 5 月 6 日 何冠環博士主持
第 12 講	可愛者甚蕃——香港文物	鄧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主任）	2006 年 6 月 3 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第 13 講	青山寺「香海名山」牌坊下的香港故事	劉智鵬（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2006 年 7 月 8 日 趙雨樂博士主持
第 14 講	霸王別姬的時空想像	葛兆光（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2006 年 8 月 5 日 危丁明先生主持
第 15 講	古希臘的神話世界	張學明（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副系主任）	2006 年 9 月 9 日 梁偉基先生主持
第 16 講	香港與世界的「客家運動」	劉義章（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2006 年 10 月 14 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第 17 講	西方傳教士與香港醫療制度的發展	黃文江（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2006 年 11 月 4 日 區志堅博士主持
第 18 講	孫中山與日本	蘇維初（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	2006 年 12 月 9 日 林啓彥教授主持
第 19 講	開埠初期的香港（1842—1860）	蕭國健（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歷史研究所暨中文系教授）	2007 年 1 月 6 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第 20 講	從畫像磚認識漢代人的生活	黎明釗（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2007 年 2 月 3 日 范家偉博士主持
第 21 講	明太祖與社區教化	朱鴻林（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2007 年 3 月 3 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第 22 講	明清戰爭中的西洋火砲	黃一農（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訪問教授）	2007 年 4 月 14 日 馮錦榮博士主持
第 23 講	晚清留日運動與近代中國	林啓彥（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2007 年 5 月 5 日 趙雨樂博士主持
第 24 講	利瑪竇與明末清初科技發展	馮錦榮（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	2007 年 6 月 2 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第 25 講	先秦時代華夷觀念之建立及其可靠性	楊靜剛（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2007 年 7 月 7 日 李家樹教授主持
第 26 講	香港與近代嶺南文化：一個地域文化的探索	鄭德華（澳門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2007 年 8 月 4 日 丁新豹博士主持
第 27 講	民族主義與國際政治	鮑紹霖（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2007 年 9 月 1 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第 28 講	「非物質文化遺產」在香港	廖迪生（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	2007 年 10 月 6 日 馬木池先生主持
第 29 講	陳寅恪與中山大學	蔡鴻生（中山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	2007 年 11 月 3 日 鄭德華博士主持

第 30 講	錢穆與新亞書院	區志堅（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高級講師）	2007 年 12 月 1 日 梁偉基先生主持
第 31 講	香港的買辦世家：莫仕揚家族	丁新豹（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名譽高級研究員）	2008 年 1 月 5 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第 32 講	從「玄武門之變」到「貞觀之治」：細說唐太宗一生事功	羅永生（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2008 年 2 月 2 日 趙雨樂博士主持
第 33 講	文武界線：北宋初年文武關係的探討	伍伯常（香港理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2008 年 3 月 1 日 梁偉基先生主持
第 34 講	從《畏齋日記》看 18 世紀江南地區的社會面貌	卜永堅（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導師）	2008 年 4 月 26 日 梁偉基先生主持
第 35 講	近代上海：一個城市的歷史記憶	梁元生（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系主任）	2008 年 5 月 10 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第 36 講	近代福建軍事之變革	李金強（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2008 年 9 月 6 日
第 37 講	香港考古新發現	吳偉鴻（香港註冊考古學家）	2008 年 10 月 11 日
第 38 講	近代中國畫報與視覺文化的興起	周佳榮（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兼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 侯勵英（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研究員及兼任講師）	2008 年 11 月 1 日
第 39 講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鄒興華（香港文化博物館館長）	2008 年 12 月 6 日
第 40 講	歷史的聲音：忍氣吞聲的「六兩四」	周家建（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研究主任）	2009 年 1 月 3 日
第 41 講	南宋事功派的軍事理念	趙雨樂（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2009 年 2 月 14 日
第 42 講	從晚明判牘看明代地方司法實況	譚家齊（英國牛津大學東方研究學院博士候選人）	2009 年 3 月 7 日
第 43 講	爲了未來，回顧往昔——尋找香港的歷史個性	鍾寶賢（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2009 年 4 月 18 日
第 44 講	歷史上的北宋楊家將	何冠環（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副教授）	2009 年 5 月 16 日
第 45 講	嬉笑讀史——廖鳳舒詠秦漢風雲人物	卜永堅（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導師）	2009 年 6 月 6 日
第 46 講	「寓居南土」與「歸葬京畿」——談談唐代大族遷居的相關問題	伍伯常（香港理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2009 年 7 月 4 日

第 47 講	守乎？棄乎？——1937 年南京衛戍戰役	梁偉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部博士研究生）	2009 年 8 月 1 日
第 48 講	古代東亞體育活動與文化交流	范永聰（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講師）	2009 年 9 月 12 日
第 49 講	隋唐胡樂盛行與今日東、西洋音樂在中國的一體化	余少華（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教授）	2009 年 10 月 10 日
第 50 講	《米芝蓮指南港澳版》是個笑話嗎？——透視東西方文化視野的相對性	馮一沖（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2009 年 11 月 7 日
第 51 講	中英街的由來與變遷	劉蜀永（嶺南大學榮譽教授）	2009 年 12 月 5 日
第 52 講	執筆從戎——談抗戰時期的香港中國新聞學院	張慧真（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2010 年 1 月 16 日
第 53 講	文化青山——談談 1940 年代的香港達德學院	劉智鵬（嶺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2010 年 2 月 6 日
第 54 講	無道之君？中興之主？——談談國史上的宋高宗	梁偉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部博士研究生）	2010 年 3 月 6 日
第 55 講	開國君主與皇后——中國王朝史的比較和再評價	周佳榮（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2010 年 4 月 17 日
第 56 講	話說秦皇漢武	張偉國（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2010 年 5 月 8 日
第 57 講	百年樹人——談談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區志堅（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助理課程總監）	2010 年 6 月 12 日
第 58 講	華商會所·中總·廠商會——中環的商業網絡與社區文化	周佳榮（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 侯勵英（香港城市大學講師）	2010 年 7 月 10 日
第 59 講	共度時艱：日佔時期的香港東華三院	丁新豹（香港歷史博物館名譽顧問）	2010 年 8 月 14 日

## ■ 相關活動

(1) 出版舉行兩週年特刊——主辦單位於 2007 年中出版了《驀然回首——歷史講堂兩週年紀念特刊》，內容包括嘉賓賀辭（梁元生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賀辭（周佳榮教授）、中華書局賀辭（翟德芳先生）、三聯書店賀辭（曾協泰先生）、主辦單位簡介、第一至二十四次「歷史講堂」介紹、活動剪影、好書推薦、名家史語和編後記。

(2) 舉辦歷史教育座談會——主辦單位於 2008 年 7 月 5 日舉辦「歷史教育座談會」，由周佳榮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主持，出席嘉賓有黎明釗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陳志華老師（香港通識教育會副主席）及王章偉、區寶文兩位資深中學教師。座談會內容圍繞著即將於 2009 年 9 月實施的新高中學制，在新學制的課程框架下，新開設的通識教育科將成為必修科目，而中國歷史科與世界歷史科仍為選修科目。在座談會上，與會者共同探討了歷史教育的現況與困境、新學制下歷史教育的發展空間，以及中史科、世史科

與國民教育、通識教育之間的互動關係等不同課題，藉此展望本地歷史教育的前景。

## 二、「歷史講堂」的主持和講者

歷史講堂第 1 講至 35 講設有主持，擔任主持的學者計有以下十五位：

周佳榮，主持第 1—2，4—6，8—9，12，16，19，21，24，27，31，35 講；

區志堅，主持第 3，17 講；

王章偉，主持第 7 講；

羅金義，主持第 10 講；

何冠環，主持第 11 講；

趙雨樂，主持第 13，23，32 講；

危丁明，主持第 14 講；

梁偉基，主持第 15，30，33，34 講；

林啓彥，主持第 18 講；

范家偉，主持第 20 講；

馮錦榮，主持第 20 講；

李家樹，主持第 25 講；

丁新豹，主持第 26 講；

馬木池，主持第 28 講；

鄭德華，主持第 29 講。

歷史講堂的主持人，分別任教/任職於本港及外地高等院校和文化機構，包括以下四十八位：

香港理工大學——何冠環，區志堅，伍伯常，馮一冲

香港公開大學——張偉國，趙雨樂，蘇維初，楊靜剛

香港浸會大學——周佳榮，鍾寶賢，李金強，麥勁生，黃文江，林啓彥，范永聰，  
侯勵英，張慧真

香港中文大學——游子安，鄧聰，張學明，劉義章，黎明釗，朱鴻林，黃一農，丁新豹，  
卜永堅，梁元生，梁偉基，余少華

香港城市大學——范家偉

香港嶺南大學——劉智鵬，劉蜀永

香港珠海學院——蕭國健

香港大學——馮錦榮

香港科技大學——廖迪生

香港樹仁大學——鮑紹霖，羅永生

中山大學——蔡鴻生

清華大學——葛兆光

澳門大學——鄭德華

英國牛津大學——沈旭暉，譚家齊

其他文化機構——鍾潔雄，危丁明，王章偉，吳偉鴻，鄒興華，周家建

### 三、「歷史講堂」各講內容簡介

#### 1. 何冠環講：「水滸群英會」（2005年5月7日）

《水滸傳》是一部家喻戶曉的古典小說，相傳作者為元末明初的施耐庵。宋江、林沖、李逵、魯智深等梁山好漢，以至大反派高俅皆為人津津樂道的人物；「豹子頭誤入白虎堂」、「宋江智取無為軍」、「高太尉大興三路兵」更是膾炙人口的小說情節。但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宋江、林沖、高俅是真有其人，還是小說家天馬行空創作出來的人物呢？假如歷史上真有其人，那麼他們出入於現實與虛構之間，是否有不同的面相呢？

#### 2. 張偉國講：「從中國版圖變遷看歷史」（2005年6月25日）

數千年來，中國經歷了數十個朝代，每個朝代版圖的擴張和收縮，隨著國力的盛衰而變化，而版圖的變化對當時的邊防，以至經濟、文化影響甚大，但讀史者往往忽略這影響深遠的因素。

#### 3. 周佳榮講：「從漫畫到動畫——創意文化產業在香港的發展及其前瞻」（2005年7月30日）

這個演講是從歷史角度出發，與你分享從漫畫到動畫的卡通世界旅程，尤其是六十年來香港漫畫文化的趨勢，以及近期美日動畫對香港社會所產生的影響。我們可以藉此思考以下幾個問題：「動漫文化」將如何轉換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這種方向可否為人類謀求更大的福祉？香港以至中國人社會可以締造自己的「動漫文化」嗎？如何借助「動漫文化」促進香港的創意文化產業？

#### 4. 沈旭暉講：「當代中東政局與兩次世界大戰」（2005年8月27日）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東地區被視為世界「火藥庫」之一，從以色列立國，六日戰爭，以、巴長期流血衝突，黎巴嫩內戰，到伊拉克出兵科威特、波斯灣戰爭，可謂戰亂頻仍，動盪不安。進入二十一世紀，隨著美國出兵伊拉克，中東地區又出現一種新的紛亂局面。

#### 5. 鍾寶賢講：「香港粵語流行文化的黃金歲月」（2005年10月15日）

香港著名填詞人黃霑先生曾說，粵語流行曲的黃金時代已一去不返；影圈中人稱香港電影的歷史任務經已完結，他們的感慨為一個縈繞三百多年的歷史現象留下註腳。1728年，清雍正帝下詔閩粵兩省成立正音書院推廣「官話」（北京話），磨平方言差異；1910年，清廷把「官話」易名為「國語」，推出《國語統一法案》；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規定，必須以「國語」授課和編寫教科書；1936年，南京國民政府立法禁止製作粵語電影……，一場語言統一運動正席捲中國。1949年以後，「國語運動」移植台灣，台灣的閩語影片與歌曲一度陷入低潮；在內地，「國語」易名為「普通話」，粵語流行文化重心順勢南遷，在香港這個「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循環再造，開花結果。

#### 6. 李金強講：「孫中山與香港——以皇仁書院作為考察」（2005年11月12日）

香港被視為近代中國革命運動策源地，此因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源起於香港，而且香港是興中會、香港同盟會等革命團體的誕生地。此外，自1895至1911年間，革命黨人以香港為基地，先後於廣東、廣西、雲南三省策動了一連串的武裝起義，最終促成辛亥革命的成功。

難怪革命史家馮自由慨而言之：「在一部革命史上，香港地位之重要，實佔全部之第一頁。」就孫中山革命思想的源起及革命同志的結合而言，實與香港中央書院（今稱皇仁書院）具有密切關係。中央書院於 1861 年創立，強調以英文為主的中英雙語、西方史地、格致的教學，從而為香港培訓出一批具有中英雙語能力與西方視野的華人畢業生。此批學生投身社會後，目睹清政府腐敗無能與衰落，遂起而主張改革，以至於投身革命。孫中山於 1884 至 1886 年間就讀該校，深受感染，遂起而鼓吹革命。與此同時，該校畢業生包括胡禮垣、韋玉、何啓、何東、謝纘泰、黃詠喬、余育之等人，他們亦相繼參與孫中山所創設的革命組織及其活動，使皇仁書院成為清季革命運動中的革命溫床。

#### **7. 趙雨樂講：「認識日本——從德川時期至近現代的進程」（2005 年 12 月 10 日）**

講者由「公家與武家的二元政治」（歷史上的貴族與天皇位置、律令制度下的公家政治、武家政權的成立精神）、「武家社會的道德基礎——武士道的源流發展」（武士道成立的前提、儒學思想對武士道的強化、從心學層次到幕末的水戶學）、「武家社會的集團意識」（關東與關西的地域性軍事集團、下層農民的共同體意識、町人文化下的專業集團）、「德川社會的武士階級」（科層官僚架構的趨勢、僚府官僚層的名目分野、下級武士的改革作用）及「近現代日本的幾次維新」（明治維新的口號、昭和維新的政治激流、平成維新的政黨改革）等 5 個小主題，講述日本從傳統至現代的改革之路。

#### **8. 游子安、鍾潔雄、危丁明講：「粵港黃大仙信仰的再認識（1890—1930）」（2006 年 2 月 11 日）**

香港黃大仙信仰可以追溯至清末廣東番禺菩山，在上世紀初傳至香港。及後，齋色園黃大仙祠成立，經過近百年的發展，已成為具本土特色的宗教民俗。講者近年實地考察及披覽文獻，在粵港黃大仙信仰課題上補充了歷史一些空白，也修正部分觀點，及梳理其脈絡源流。

#### **9. 范家偉講：「中國歷史上的瘟疫與社會」（2006 年 3 月 4 日）**

瘟疫是人類的大敵，在中國歷史上，每個朝代都會發生「疫」、「疾疫」、「瘟」。瘟疫不只是醫學上的問題，也是社會、政治、經濟的問題，瘟疫可以殺人無數，也會令朝代覆亡，甚至令文明斷絕。一場瘟疫來臨，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也改變了我們的人生態度。古人在瘟疫來襲時，除了恐懼之外，還會有甚麼反應？這些反應對中國文化又有甚麼影響？古人如何解釋瘟疫的發生？

#### **10. 王章偉講：「中國與西方歷史上的巫覡與巫術」（2006 年 4 月 1 日）**

提起巫覡和巫術，一般人定然不會陌生，近年來《哈利波特》及《魔戒》的熱潮席捲全球，使我們對這種文明世界裏的魔法師更是耳熟能詳。然而，男覡女巫，所指的究竟是哪些人？巫術實際的內涵又是甚麼？古今中外的巫覡和巫術是否都一樣？在高度文明的社會裏，何以存在著這種跡近迷信的民俗？

#### **11. 麥勁生講：「納粹黨的興起與新納粹主義」（2006 年 5 月 6 日）**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崛起的納粹黨，曾為許多經歷戰敗的德國人帶來無限的希望與憧憬。結果，它為德國，以至整個歐洲帶來的，卻是戰爭的苦難與種族的仇恨。儘管如此，歷

史卻充滿弔詭，今天仍有一批擁護納粹黨的人士，他們被稱為「新納粹主義分子」。新納粹主義是二戰後產生的一種政治思潮，旨在延續納粹精神，以保持種族純粹為課題，強調白人優越。近年來，新納粹事件在全球頻繁發生，除了暗殺、爆炸、引發騷亂等暴力方式外，他們亦會採取較為「文明」的方式進行宣傳和鼓動。

#### 12. 鄧聰講：「可愛者甚蕃——香港文物」（2006年6月3日）

香港中文大學考古隊近年來在香港的考古不斷有新的發現，重要的收穫，如現時最古老的礫石石器文化，7,000 多年前本地與長江中游湖南地區文化交流的證據，4,500 多年前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某種因素在本地的擴散，3,500 年前海邊漁村聚落的發現，商代禮器牙璋在香港的流傳，先秦人面弓形格銅劍文化圈的確立，以及西漢時期的文化遺存等，皆令人耳目一新。是次講演，講者將為大家介紹本地相關考古之新發現，讓我們對香港的歷史有更深層的認識。

#### 13. 劉智鵬講：「青山寺『香海名山』牌坊下的香港故事」（2006年7月8日）

上世紀 20 年代，港督金文泰先後兩次遊歷青山，為當地風光所吸引，後來修建了牌坊，牌坊上「香海名山」四個字正是出自他的手筆。從牌坊本身所蘊含的故事，既可以說明青山和青山寺與近代中國和香港的名人的淵源，也可以了解青山寺以及屯門的歷史。

#### 14. 葛兆光講：「霸王別姬的時空想像」（2006年8月5日）

《史記》項羽本紀約有萬字，其中提及「虞美人」的記述，出現在共有近 160 字的「垓下之會」片段裏。而這不到二百字的歷史記述，自唐宋迄今，在詩詞、戲曲、小說、電影、歌曲、話劇等不同的文學體裁中，都出現了不同的演繹和發揮，成為一齣齣蕩氣迴腸的「霸王別姬」。歷史講堂這次請來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葛兆光，以「霸王別姬的時空想像」為題，就《史記》以來，各種有關「霸王別姬」的文學和藝術作品，探討人們是怎樣通過歷史的象徵和話題，來表達一代一代人的心情。史實如何變成回憶，回憶如何變成想像。虛構的文學和記實的歷史之間，彷彿有節時空隧道，讀者可隨意徜徉。

#### 15. 張學明講：「古希臘的神話世界」（2006年9月9日）

神話的出現，是古人對世界起源、自然現象及社會生活的原始理解的一種反映，通過超自然的形象和幻想的模式孕育出不同的故事和傳說。古希臘應該是擁有最完整的神話系統的文明之一。眾神之神宙斯（Zeus）、智慧女神雅典娜（Athena）及太陽神阿波羅（Apollo）等，都是古希臘神話中家喻戶曉的人物；特洛伊（Troy）的木馬計、俄狄浦斯（Oedipus）的悲劇及奧德修斯（Odysseus）的遊歷，更是老少皆知的故事。

#### 16. 劉義章講：「香港與世界的『客家運動』」（2006年10月14日）

客家為漢族民系的一支，自魏晉以來，因戰亂、饑荒等而四處遷徙，所到之處，自稱為「客」以別於當地土著。漢族一向慎終追遠，雖客寓他鄉，對祖輩傳下的文化傳統亦固守不棄，於是漸漸形成自己獨特的客家文化。所謂「客家運動」，簡單而言，是指客家人不斷遷徙的活動，但從更深層次而言，就是指客家人在十九、二十以至二十一世紀所形成的跨地域和

國界的族群團結運動。是次講座，講者將從宏觀的角度，分析香港與世界的「客家運動」的起源，及其演變與發展，讓大家認識客家人如何成爲一個具備凝聚力的族群。

#### **17. 黃文江講：「西方傳教士與香港醫療制度的發展」(2006年11月4日)**

早期到港的西方傳教士，除了傳播宗教之外，更是中西文化交流主要的「中介人」，其中西方的醫療技術的傳入影響深遠。早在1840年代，合信(Benjamin Hobson)醫生不單成立了醫院及診所，他更努力地使西醫爲華人所接受。後來不少的傳教士延續了他的使命。1887年成立的雅禮氏紀念醫院及香港西醫書院，就是在華人領袖何啓、倫敦傳道會傳教士及香港各界紳商的支持下成立。及至香港大學醫學院成立以後，仍有不少具有傳教士背景的人物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王國棟教授(Prof. Gordon King)。除了教學成就出眾之外，王教授憑藉其以往在中國教會大學的背景，在日本佔領香港初期成功安排港大醫學院的學生到內地延續學業。二次大戰後，另一位傳教士巴治安醫生(Dr. E. H. Paterson)也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除了在雅麗氏醫院工作之外，他更協助由傳教士一力促成的將軍澳醫援會的工作，又爲基督教聯合醫院的成立及運作做出貢獻。是次演講，講者將探討西方傳教士與香港醫療制度發展的關係。

#### **18. 蘇維初講：「孫中山與日本」(2006年12月9日)**

孫中山與日本很早已結了不解之緣。晚清時期的革命運動，以及民初起兵「討袁」的活動，很多時候都在日本策劃及籌備。革命黨人的組織——同盟會和中華革命黨，也是在日本東京創立。同時，孫中山與日本各階層人士往來密切，結識了日本友人多達百多位。這種深厚的歷史淵源，令到孫中山對日本一直抱有期望。最明顯的是在1924年11月，他在北上途中經過神戶時，提出了大亞洲主義的主張，他期盼著中日兩國在同文同種的基礎上攜手合作，抵抗西方的侵略。是次講座，講者將討論孫中山的日本觀和大亞洲主義的思想，以及日本有識之士對這種觀點的回應，並會進一步探究大亞洲主義不能成爲國民黨內主流思想的原因。

#### **19. 蕭國健講：「開埠初期的香港(1842-1860)」(2007年1月6日)**

自新航路開通以後，英國便積極在海外尋找商機。明代萬曆年間，英皇伊利沙伯曾多次派船隊前往中國，但沒有打開中國的門戶。清代乾、嘉之世，英國先後兩次派出使團訪華，卻因爲「禮儀」等問題，同樣是無功而還。直到道光年間，東西方兩大帝國因鴉片問題再起爭端。結果，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戰敗，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在中國歷史上，《南京條約》標誌著大變局的來臨；在香港歷史上，它也改變了香港在往後百多年的歷史進程。從此，香港成爲英國在遠東地區的殖民地；在中國歷史以至中外關係史上，香港都扮演著特殊的角色。是次講座，講者將爲大家介紹香港島開埠頭二十年的歷史，並重構英人佔領初期香港島的面貌。

#### **20. 黎明釗講：「從畫像磚認識漢代人的生活」(2007年2月3日)**

研究秦漢時期歷史的學者過去都以文獻爲探討對象，探索的歷史問題基本上環繞治亂興衰、典章制度等政治和學術思想問題。囿於史料的性質，學者較少注意普羅大眾的問題，例如經濟活動、百姓生活、宗教信仰和地方組織等各種社會現象。在二十世紀，內地考古學者

在漢代墓葬的考古發掘和對邊區的亭、障、烽、隧遺址的考察中，發現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包括珍貴的居延、敦煌、睡虎地、張家山等地的秦漢簡牘；出土了大量生動的圖像，例如洛陽漢墓的壁畫，新鄭的畫像磚、微山漢畫像石等資料，考古學者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到珍貴的材料，為探討漢代社會面貌提供一個新方向。

#### **21. 朱鴻林講：「明太祖與社區教化」（2007年3月3日）**

談到貧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大多數人只會想起他用嚴刑峻法對付貪官和頑民，卻不太知道他也在基層社區推行眾多的教化措施，嘗試塑造一個風俗淳厚的理想社會。明太祖在位期間建立和施行社學、旌表節孝、鄉飲酒禮等制度，又敕撰《資世通訓》等多種強調道德教化的書籍；晚年又向鄉里頒佈《教民榜文》，內容包括安排「木鐸老人」按時在道路上唱頌「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等訓詞，可見其用心所在。

#### **22. 黃一農講：「明清戰爭中的西洋火砲」（2007年4月14日）**

十五、十六世紀是歐洲文明所開創「大航海時代」的起點，他們以堅船利砲為後盾，一波波地強烈衝擊包括亞洲在內緊鄰大洋的各個國家，自此，西方文明逐步傳入中國。後來，葡萄牙軍事顧問團在山東協助明朝政府訓練了一支當時戰鬥力最強的部隊，他們的主要將領均信奉天主教，並秘密引進了砲規來增進瞄準技術，這種砲規是最早的計算尺，它能將火砲發射所需的複雜數學和物理知識，化約成簡單的尺規刻畫……不幸，這支以砲兵見長的部隊卻因有兵士偷雞被懲罰而叛變，最後投降清朝，從此改變了中國戰場上的形態，並幫助滿洲人佔領中國。

#### **23. 林啓彥講：「晚清留日運動與近代中國」（2007年5月5日）**

晚清時期，中國政府先後推行了三次有規模的派遣學生留學外國的措施。第一次為19世紀70年代由總理衙門主持派遣留美幼童及留歐學習海軍的留學運動，第二次為19世紀90年代由維新派倡議的留學日本運動，和第三次於20世紀初，由庚子退款所促成的留學美國運動。這三次的留學運動對中國近代化過程都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其中尤以留日運動規模最盛，而對近代中國的歷史發展之影響亦至為深遠。這場留日運動帶來了中國在政治、社會、教育與學術文化等範疇的重大變革，使中國從此全面地踏上近代化之路。

#### **24. 馮錦榮講：「利瑪竇與明末清初科技發展」（2007年6月2日）**

耶穌會對近代學術最有意義的貢獻，在於引進一種新的「知識觀」。耶穌會的科技文化（Jesuit Science）是傳統經院哲學與17世紀近代科學（以伽利略為代表）之間的橋樑。作為首位入華耶穌會士覬見明朝萬曆皇帝並於北京建立會院的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早於16世紀80年代已對歐洲中世紀以至文藝復興晚期的科學典籍及相關知識進行系統研究，翻譯和介紹入華。在這個譯介互動過程中，中外教友和教外知識分子對漢語體系中固有的字詞、語彙和概念作了主知性（intellectualistic）的創造轉化，豐富了明末清初國人的思維和知識視域。本講主要講述利瑪竇在西方辭書編纂學、天文學、地圖測繪學、計時學及科學儀器製作等領域所作的貢獻，並蠡析利氏及其後繼者與明末清初科技發展的關係。

**25. 楊靜剛講：「先秦時代華夷觀念之建立及其可靠性」(2007年7月7日)**

不少中外歷史學家都有一種看法，認為先秦時期的華夏國家普遍存在一種輕視周邊民族及其文化的心理，這些華夏國家稱呼自己為「中國」，而「中國」的周邊民族則被她們稱呼為「夷狄」。這種華夷觀念及華夏沙文主義，直至近代中國才逐漸消失。但是，中國的華夷觀念究竟始於何時，卻是人言人殊：有人認為始於西周，亦有人認為始於商周之際，更有人認為始於夏朝。是次講座，講者將根據考古材料、商周卜辭、金文及先秦典籍的記載，探討先秦時期華夷觀念的出現，並進一步討論當時周邊民族文化是否真的落後於中原。

**26. 鄭德華講：「香港與近代嶺南文化：一個地域文化的探索」(2007年8月4日)**

由於特殊的地理和歷史條件，嶺南地域的文化核心城市的近代化來得特別早。從十八世紀中葉開始，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發展，廣州和澳門已成為具備現代形態的海港城市，連同在十九世紀中葉剛剛崛起的香港，嶺南地域呈三角形的文化核心組合終於形成。香港在嶺南地域的近現代文化發展過程中，既繼承和發揚了嶺南地域開放、外向及兼容的文化特色，同時，亦保留了不少中國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元素。另一方面，香港對嶺南地域以至近代中國在大眾文化方面的發展，亦有其獨特的貢獻。是次講座，講者將探討香港在近代嶺南地域文化發展中的地位和角色，以及探討香港能夠成為嶺南地域文化核心城市所具備的條件。

**27. 鮑紹霖講：「民族主義與國際政治」(2007年9月1日)**

所謂民族主義，是指以共同文化為背景，在政治與文化合一的基礎上實現民族認同與發展的一種心理狀態與行為取向。在近代中國，梁啟超率先於1901年發表的〈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中提出民族主義，後來，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亦包括了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就成為中國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武器。可是，不少學者都提出民族主義可能是一柄雙刃劍，雖能釋放出團結民族和國家的能量，但亦可能會造成巨大的破壞力量，增添國際間的衝突及導致某些國家甚至民族走向衰亡。是次講座，講者將析論此說，並從國際政治角度，討論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基本特色、演變及我們對它應有的認識及態度。

**28. 廖迪生講：「『非物質文化遺產』在香港」(2007年10月6日)**

根據2003年10月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公約》，「非物質文化遺產」涵蓋五個範疇：(1) 口頭傳說和表述，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2) 表演藝術；(3) 社會風俗、禮儀、節慶；(4) 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5) 傳統的手工藝技能。截至2005年11月為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共公佈了九十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中包括摩洛哥的說書人、日本的能劇、中國新疆的維吾爾木卡姆藝術等。隨著該公約於2006年4月適用於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已成為很多香港市民談論的話題。但是，甚麼才算是「非物質文化遺產」？「茶餐廳」又是否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次講座，講者將會以香港作為個案，跟大家一同討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定義、形式及其存在的意義等。

**29. 蔡鴻生講：「陳寅恪與中山大學」(2007年11月3日)**

提起陳寅恪教授，大家立即會想到，他是近代中國著名的國學大師、史學家和詩人，其祖父陳寶箴、父親陳三立都是清末的維新派人士。陳寅恪教授擅長以詩證史，並懂得多種中

亞文字，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等，都是他早期影響深遠的著作。1949年以前，他主要執教於清華大學，為該校「四大導師」之一。1949年以後，他遷居廣州，任教於嶺南大學和中山大學。這段時間，他除了繼續自己的學術研究，寫下了《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等作品外，也為當時中國的學術界培育出不少人才，蔡鴻生教授就是其中一位。是次講座，蔡鴻生教授會從陳寅恪教授的名、字、號說起；然後用親身的經歷和具體的事例，來談陳寅恪教授在中山大學如何教書和如何寫書；並討論陳寅恪教授晚年的蘇（東坡）、柳（如是）情結。

### 30. 區志堅講：「錢穆與新亞書院」（2007年12月1日）

錢穆先生是近代中國著名的國學家、史學家，《先秦諸子繫年》、《國史大綱》、《論語新解》、《朱子新學案》等都是錢先生享譽學林的著作。錢先生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事蹟，就是他與唐君毅等學者於1949年在香港創辦了新亞書院。新亞書院的理念在於發揚中國傳統文化，致力於現代學術的研究，使學生除對本國傳統文化具備深切之了解外，並具有應付現代社會所需的知識與技能。創校以後，新亞書院先後經歷過「桂林街時代」、「農圃道時代」，直至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新亞書院正式成為大學三所成員書院之一。是次講座，講者將介紹香港學術文化的發展史，尤其著重錢先生對香港學術發展的影響及貢獻，並會探討1950至1960年代的新亞書院師生，如何在生活上實踐「新亞精神」。

### 31. 丁新豹講：「香港的買辦世家：莫仕揚家族」（2008年1月5日）

「買辦」是19世紀中外貿易的產物，他們在中國近代史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他們與南北行商人成為香港華商中兩股最大的力量，同時，亦是本港的華人領袖。當時芸芸的買辦中，論財富之多、勢力之大、影響之深遠，首推香山莫仕揚家族。莫家三代：莫仕揚、莫藻泉、莫幹生，都曾擔任太古洋行買辦，其家族成員在太古洋行盤根錯節、人多勢眾，影響力延續達一甲子，甚至有「只知有莫氏家族，而不知有外籍大班」之說法。莫家三代不但生財有道，還樂善好施，祖孫三代均與東華醫院結下不解緣，其中莫仕揚更在東華草創之際，兩度出任主席，奠定了東華的百年基業，可謂貢獻良多。是次講座，講者將闡述莫仕揚充當買辦之緣起及經過、分析十三行衰落與買辦崛起之關係，並介紹莫家三代對太古洋行之貢獻及他們所從事的慈善事業。

### 32. 羅永生講：「從『玄武門之變』到『貞觀之治』：細說唐太宗一生事功」（2008年2月2日）

唐朝初年，長安城的太極宮是皇宮以及朝廷中樞所在地，亦是唐朝三大皇宮中最早興建的一座。太極宮的北門，名為「玄武門」，這裏在唐朝初年曾發生過一場宮廷政變，史稱「玄武門之變」。這場政變既是李世民一生事功的轉捩點，也關係著唐帝國的命運，因為它造就了後來的「貞觀之治」，開創出初唐盛世。是次講座，講者將從唐初君臣父子的關係來探討「玄武門之變」的發生背景及其過程，並會分析唐太宗一生的事功。

### 33. 伍伯常講：「文武界線：北宋初年文武關係的探討」（2008年3月1日）

北宋的文官武將一向被歷史學者劃分為兩個截然不同、兼有高下等差的職能群體，從而衍生出「武不如文」、「重文輕武」、「崇文抑武」等說法，成為我們理解北宋初年文武關係的

主流觀點。可是，文官武將之間的界線，並非如此涇渭分明。當時，既有熟習武藝韜略的文官，也有深諳文才治術的武將；而且文官武將之間的往來，也是非常密切的。由此可見，文官「武質化」和武將「文質化」乃屬當時之普遍現象。是次講座，講者將重新審視北宋初年文武之間的界線，並會分析「重文輕武」等說法是否恰當。

#### 34. 卜永堅講：「從《畏齋日記》看 18 世紀江南地區的社會面貌」（2008 年 4 月 26 日）

《畏齋日記》的作者詹元相，是清朝初年徽州府婺源縣慶源村的生員。他曾多次參加江南鄉試，可惜未能考取舉人。這部日記記錄了他在 1699 年至 1706 年間所經歷的日常瑣事，包括從事借貸、土地買賣、調解宗族和村落之間的糾紛、以至代表宗族打官司等活動。它是我們了解當時江南地區社會面貌的重要資料。是次講座，講者將以《畏齋日記》為主要材料，為我們介紹 18 世紀江南地區的社會面貌。

#### 35. 梁元生講：「近代上海：一個城市的歷史記憶」（2008 年 5 月 10 日）

提起上海，一般人都不會感到陌生，近年來上海經濟的高速發展，更令這個曾經是「十里洋場」的大都會成為世人的焦點。近代史裏的上海，總讓人聯想到杜月笙、黃金榮等顯赫一時的黑道人物；青幫、紅幫等橫行地方的幫派；大世界、外灘等中外聞名的歷史地標；以至法租界、公共租界等列強侵華的鐵證。可是，上海給予我們的歷史記憶絕非僅此而已。是次講座，梁元生教授將以人物和社會組織等作為討論的切入點，探討晚清至民國時期上海的公共空間及城市文化特色，為我們尋找上海的歷史記憶。

#### 36. 李金強講：「近代福建軍事之變革」（2008 年 9 月 6 日）

福建為我國東南沿海邊省，東面臨海，西為山嶺。自古內憂外患不斷，及至 19 世紀以降，內有閩南小刀會之亂，以及太平軍四次入閩；外則列強相繼入侵，較著者如中英鴉片戰爭、中日牡丹社事件、中法越南戰爭及中日甲午戰爭，福建皆無役不與。及至日據台灣後，日人實施「對岸政策」，以福建為其禁嚮。福建在此內憂外患之局勢下，地方督撫遂力謀整頓軍備，保家衛國：一方面創建福州船政局，建立海軍及培養海軍人才；另一方面則裁撤綠營，改以西法練兵，務求創建新式的海陸軍種，成為清季軍事近代化之前哨省份。

#### 37. 吳偉鴻講：「香港考古新發現」（2008 年 10 月 11 日）

自《環境評估條例》實施以來，香港考古有很多重要的發現，其年代跨度超過 10,000 年。這些新發現包括：香港古代自然環境的復原、西貢 10,000 多年前的採石場、龍鼓洲和屯門 7,000 年前的陶器、西貢 4,000 多年前的稻米、鑽石山的宋盜、佛頭洲的清末稅關遺址、啓德機場的龍津碼頭……這些新發現足以改變人們對香港歷史的固有看法，也足以改變人們對香港在中國古代角色的認識。它們具有一定的社會和文化意義，反映了人們對香港歷史有了新的詮釋。因為市民日益重視文化遺產的保護，所以相關的行政法規亦一一出台，為未來香港考古提供了資源和法規依據。

#### 38. 周佳榮、侯勵英講：「近代中國畫報與視覺文化的興起」（2008 年 11 月 1 日）

畫報是一種以畫像為主、文字為輔的出版物，屬資訊報導和消閒閱讀性質。以現代學術

的語言來說，畫報就是一種視覺文化，直接以畫面來表達一些文字無法表明的意境，以通俗易懂的圖文來加強作者和讀者之間的聯繫。中國畫報發展始於晚清時期的上海，例如《小孩月報》（1875年）、《瀛寰畫圖》（1877年）、《點石齋畫報》（1884年）等，奠定了中國畫報的基礎，其特點是以繪畫形式介紹國內外時事新聞以至風俗人情等新知。到了民國時期，隨著印刷技術的進步和照相技術的引入，畫報不論在形式上、內容上均有所創新，中國畫報的發展得以進入一個新紀元。是次講堂，講者會先扼要描述近代中國畫報的發展歷程，然後選取三份畫報，包括1926年在上海創刊的《良友》畫報、1931年在廣州創刊的《兒童週刊》和1937年在上海創刊的《少年畫報》以作介紹，透過這三種分別以大眾、兒童及青年為對象的刊物，了解畫報的出版面向以及不同階層的消閒閱讀風氣，展示畫報在當世對推動普及閱讀習慣的意義。

#### **39. 鄒興華講：「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2008年12月6日）**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於2006年4月開始適用於香港，至今已超過兩年。「非物質文化遺產」已成為市民大眾談論的焦點，例如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定義、國際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歷史，以至內地和香港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方面的情況等，都是大家關心的內容。是次講座，講者將透過大量的幻燈片，介紹這條公約產生的背景、主要內容，以及內地和香港為配合公約生效而所做的保護工作。

#### **40. 周家建講：「歷史的聲音：忍氣吞聲的『六兩四』」（2009年1月3日）**

「口述歷史」在近30年來已逐漸成為國內外史學家和學術機構蒐集歷史資料的一種重要形式。有別於傳統的歷史研究方法，它蒐集受訪者的親身親歷以及所見所聞，通過口述和筆錄，成為珍貴的歷史資料，彌補文獻的不足。香港近代史研究中，1941至1945年的日佔時期是一個十分特別的課題，其吸引之處在於它涵蓋了戰爭史、社會史、經濟史、日本近代史等不同範疇。我們研究香港日佔時期的歷史時，除了閱讀當時的檔案和報刊之外，透過訪問經歷過日佔時期的耆老，又會有甚麼新發現呢？

#### **41. 趙雨樂講：「南宋事功派的軍事理念」（2009年2月14日）**

南宋建國以來，偏安的局面形成，政治以外同樣強調學問修養的理學。但在金人窺伺的情勢下，以陳亮（1143-1194）和葉適（1150-1223）為代表的事功學派，更加深切關注存在於軍事、政治，以至社會民生的各種現實難題，並努力克服這些難題，故積極提出建設性的治國策略。是次演講，講者將會分析陳亮和葉適的兵學見解，從而讓讀者認識南宋事功學派的軍事理念。

#### **42. 譚家齊講：「從晚明判牘看明代地方司法實況」（2009年3月7日）**

近人研治明代司法制度，每以明初個別極端例子作以偏概全的綜述，而且多集中於中央層面的討論，卻忽略了地方司法的情況。更甚者，是以明清章回小說的司法事件，當作案例討論，以文學為史學，令人們對明代地方司法產生了非常負面的印象。是次講座，講者選取《盟水齋存牘》和《折獄新語》的判牘跟讀者一同討論，並透過這些判牘所反映的地方司法制度，採取對照比較的方法，觀察晚明時期不同的法官對各類型案件的處理方法。

#### 43. 鍾寶賢講：「爲了未來，回顧往昔——尋找香港的歷史個性」（2009年4月18日）

選擇如何記錄我們的歷史，往往決定了我們將來要走怎樣的路。金融海嘯席捲全球，香港面對八方風雨之際，大家都認爲是時候反思香港的金融中心角色，是否應作調整、另覓出路；但有待我們反思的，又豈只是香港的經濟角色呢？在是次講座中，土生土長的鍾寶賢將會帶大家走進時光隧道，重訪九龍城和銅鑼灣等地區，透過生動有趣的新舊相片、文獻資料、電影片段和口述材料等，尋找這個城市的個性和興衰起落；展現她的地道與國際、懷舊與趨時的多重性格，更嘗試追塑這種歷史性格形成的原因和過程。

#### 44. 何冠環講：「歷史上的北宋楊家將」（2009年5月16日）

宋朝建國後受到遼朝的軍事威脅，在這種氛圍影響下，宋朝民間開始流傳著一些抗遼軍人的英雄故事，其中包括楊家將的故事。楊業、楊延昭、楊文廣三代捍衛宋朝邊疆，後來楊家將的事跡逐漸成爲膾炙人口、老嫗皆知的民間故事，並被改編成小說、話本、雜劇、京劇和各種地方戲。是次講座，何冠環博士帶領我們走入楊家將的小說世界，讓我們遊走於歷史與小說之間，認識歷史上楊家將的面貌。

#### 45. 卜永堅講：「嬉笑讀史——廖鳳舒詠秦漢風雲人物」（2009年6月6日）

廖恩燾（1864-1954），字鳳舒，號懺盒，是中國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胞兄，留學日本，出使古巴，隱居香港。廖恩燾的名氣雖不及廖仲愷，但在清末民初政界文壇，均別樹一幟。他才氣過人，捧讀其《嬉笑集》，不得不佩服其對仗之工整、用典之嫻熟，而熟悉粵語之人，對於其「生鬼」之粵語口語，更倍感親切。在語言政治極爲畸形的今天，不妨跟隨廖恩燾嬉笑一番，一來以爲某種「語言治療」，二來可以把秦漢歷史「愉快學習」一番云。

#### 46. 伍伯常講：「『寓居南土』與『歸葬京畿』——談談唐代大族遷居的相關問題」（2009年7月4日）

對於唐代仕宦之家而言，遷徙京畿與家族官僚化兩者有極爲密切的關係：遷徙京畿爲家族仕宦提供方便，家族官僚化同時亦將遷徙京畿的取向固定下來。然而，單憑仕宦之家普遍歸葬京師，並不足以充分說明遷徙京畿的內容；要更準確了解，便必須充分認識仕宦之家歸葬地點與生活區域之間的差別。是次講座，講者將透過對世家大族「情貴神州」和「所業唯官」這兩種取向的觀察，闡述唐代政治社會格局的變化，以及世家大族如何因應現實環境的轉變而調整發展策略，藉此保持長期以來所享有的聲勢和威望。

#### 47. 梁偉基講：「守乎？棄乎？——1937年南京衛戍戰役」（2009年8月1日）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北平、天津相繼淪陷，上海局勢同樣是劍拔弩張。8月13日上午九時十五分，日本在上海的海軍特別陸戰隊越過租界佈防，並攻擊中國保安隊，十時三十分，國軍與日軍發生衝突，黃昏時分，日軍在戰車掩護下突襲國軍八十七師陣地，晚上，蔣介石向京滬警備司令張治中下達總攻擊軍令，「淞滬戰役」爆發。其後，日軍不斷增兵，在陸、海、空軍協同作戰下，猛攻上海；國軍亦不甘示弱，投入七十八個師奮力迎戰，雙方血戰近三月，至11月5日，日軍登陸金山衛，國軍撤退已成定局，11月11日，上海市

長發表《告市民書》，沉痛宣佈上海淪陷。上海失守後，日軍距離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只有三百公里，「是否進攻南京？」成爲不少日軍將領私下談論的話題；「是否堅守南京？」亦成爲蔣介石與國軍將領要嚴肅思考的問題。一場關乎國家存亡、民族尊嚴的首都保衛戰一觸即發……

**48. 范永聰講：「古代東亞體育活動與文化交流」（2009年9月12日）**

東亞地區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區內各族人民自古以來已十分喜愛形形色色的體育活動，彼此之間更有極頻繁的體育文化交流。這些體育活動，既展現了東亞各個民族的活力及獨特的民族特性，也反映了他們崇高的文化成就。是次講座，講者將從深入淺出的角度考察古代東亞地區盛行的體育活動，進而觀察古代東亞各個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

**49. 余少華講：「隋唐胡樂盛行與今日東、西洋音樂在中國的一體化」（2009年10月10日）**

五四以來，「現代化」已成了中國人理直氣壯的口頭禪。近年更流行的是「全球化」、「一體化」。中國樂器如琵琶、二胡等在歷史上曾先後有過「胡琴」的名稱。但今日在中、港、台及海外的華人社區，更流行的樂器卻是西方的鋼琴及小提琴。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急劇變化，中國音樂與東、西洋音樂，是否必然一體化？若真的要化，要化些甚麼？將從隋唐說起，比較古今的一些相似現象，與關心這課題的朋友分享這些年來一些個人的觀察與體會。

**50. 馮一冲講：「《米芝蓮指南港澳版》是個笑話嗎？——透視東西方文化視野的相對性」（2009年11月7日）**

《米芝蓮指南港澳版》被業界批評是個笑話，以外國人的眼光與標準月旦本地飲食文化。然而，在啓動保護機制之時，也別忘記要放遠眼光，擴闊視野。是次講座將以飲食作爲切入點，引導聽眾學習欣賞其他文化的世界觀。

**51. 劉蜀永講：「中英街的由來與變遷」（2009年12月5日）**

一街兩制的沙頭角中英街是令人感到十分神秘的地方。講者將介紹中英街及其街名的由來，不同歷史時期中英街興衰、變化的故事，揭開中英街神秘的面紗，並展望中英街及沙頭角禁區發展的前景。

**52. 張慧真講：「執筆從戎——談抗戰時期的香港中國新聞學院」（2010年1月16日）**

1939年中國新聞學院在香港成立，至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前停辦，其間共招收了三屆學生。學院於抗戰勝利後復辦，招收兩屆學生後，於1948年改爲函授課程，及後更因故停辦。香港中國新聞學院雖然歷史不長，但名師雲集，人材輩出——院長郭步陶爲上海《申報》原總編輯，副院長金仲華爲香港《星島日報》總編輯，客座講者亦包括多位著名學者。不少中新的畢業生後來成爲香港和國內政治、文化和教育界上的著名人物，如楊奇、鄧丁、薛君度、趙世光、胡漢輝等。這所師資一流的學院，其實是一所「三無學校」——無校舍、無設備、無固定老師。這反映了淪陷前香港的社會、政治和文化上的複雜和矛盾情況。講者在是次講座中，將介紹中新的成立背景和辦學特色，並通過中新師生的口述歷史，重構淪陷前香港複雜的社會面貌和戰時青年人的心境及抉擇。

**53. 劉智鵬講：「文化青山——談談 1940 年代的香港達德學院」（2010 年 2 月 6 日）**

達德學院是在中國內戰的背景下由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合作在香港的屯門建立的一所大學。學院的教育理想是以自由研究的精神，建立一所新型民主大學。學院羅致了不少知名學者到來任教，例如鄧初民、侯外廬、沈志遠、千家駒、許滌新、黃藥眠、胡繩、鍾敬文、翦伯贊等。又經常邀請名人作專題講座，包括李濟琛、何香凝、蔡廷鍇、柳亞子、沈鈞儒、喬冠華、郭沫若、茅盾、夏衍、曹禺、周而復、臧克家、歐陽予倩、黃谷柳等。這所高等院校從 1946 年 10 月創立到 1949 年 2 月結束，只有短短的兩年零四個月，培育了約一千名學生。達德學院在中國當代革命史、香港教育史以及中國教育史上佔有不可低估的地位。

**54. 梁偉基講：「無道之君？中興之主？——談談國史上的宋高宗」（2010 年 3 月 6 日）**

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難不僅改寫了宋王朝的歷史，同時扭轉了宋徽宗、宋欽宗、宋高宗三位君主的命運。徽宗、欽宗父子成爲金人俘虜，最後客死異鄉，高宗在宋室危急存亡之際卻繼承大統，成爲南宋王朝的開國之主。高宗理應成爲受後人讚頌的中興之主，但是，他向金人求和、任用秦檜、冤殺岳飛，令他在國史上的形象大打折扣，甚至有人罵他是無道之主。是次講座，講者將從南宋初年的重大政治事件中分析高宗所扮演的角色，並與關心這課題的朋友分享一些個人的觀察與體會。

**55. 周佳榮講：「開國君主與皇后——中國王朝史的比較和再評價」（2010 年 4 月 17 日）**

中國歷史上有數以十計的大小王朝，歷代君主不下三數百人，當中較爲世人所熟知的，主要是開國之君、中興名主、末代皇帝以及別具一格的君王。而宮廷內后妃的人數，更是帝王的數十倍以上，他們的各種活動和悲歡事蹟，構成了一部綿延五千載的中國王朝興衰史。這個演講著眼於歷代開國君主和他們的皇后，以統計學和比較史的方法作一些分析，就他們在歷史上的評價問題再思考，藉此提高大家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興趣。而最重要的是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究明中國著名帝后所起的作用。

**56. 張偉國講：「話說秦皇漢武」（2010 年 5 月 8 日）**

秦始皇和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兩位曾經建立蓋世功業的「雄主」，他們的作爲可說是不相伯仲，各有千秋；但他們的結局和歷史評價卻有天淵之別。後世人（包括現代人）對秦皇和漢武的認知，往往來自教科書、戲劇和旅遊的解說，這些資料的來源，又往往是來自二千年來層累建立的傳說和評論，經作者們藝術加工、推想建構、濃縮概括，所營造而成的形像，然後再以道德標準加以衡量評說。於是後人慣常認知的秦皇漢武，已經不是歷史上的真實面貌，而是爲歷史批判而樹立的形像。是次講座，講者將從歷史資料去找尋秦皇漢武的真實形像，撥去迷霧，從他們所處的時代、社會、文化狀態破解隱秘史事的謎團，重新認識這兩位「一代雄主」。

**57. 區志堅講：「百年樹人——談談香港大學中文學院」（2010 年 6 月 12 日）**

香港大學早於 1910 年成立，但爲甚麼遲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才成立中文學院？中文學院的成立，與華裔、西裔、晚清遺老及歷史時代的關係又是怎樣呢？及至中文學院成立後，課程發展經歷自前清遺老所訂的方向走往漢學的歷程，直至今日，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課程仍承

襲這種學術特色，為本地的中文教育以至中國文化的承傳作出重要貢獻。是次講座，講者將與關心這課題的朋友一起分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八十多年來的發展歷程。

**58. 周佳榮、侯勵英講：「華商會所·中總·廠商會——中環的商業網絡與社區文化」**

**(2010年7月10日)**

2010年是中華總商會（簡稱中總）成立一百一十周年誌慶，而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簡稱廠商會）已於2009年慶祝成立七十五周年。在中環海傍干諾道中這兩個「兄弟商會」之間，是1897年成立的華商會所，並排而列，結成香港以至世界華商活動網絡的一個平台。百多年來，中環不僅是金融商貿活動的場所，也為文化教育事业提供了發展空間，同時又是華洋雜處和「老街坊」的華人社區。由於全球化浪潮激盪和本地社會變遷，國際品牌名店紛紛進駐中環，華人社區正在逐漸消退，文化教育機構相繼撤出，商業與文化互惠相澤的環境勢將大受影響，這對於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其實不是有益的。這個演講將從歷史學研究者的角度概述華商會所、中總和廠商會三者的發展和聯繫，以及其與中環社區的連帶關係。並透過敘述曾任華商公局和香港華商總會主席（即中華總商會第三屆、第五屆會長）的香港傑出華人劉鑄伯（1866–1922）的生平及其事功，來闡揚香港華商對家國的濃厚情懷。

**59. 丁新豹講：「共度時艱：日佔時期的香港東華三院」(2010年8月14日)**

1941年聖誕節，香港淪入日本手中，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香港經歷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時期，這是香港歷史上最黑暗的歲月，經濟蕭條、物資短缺、貨幣貶值、物價飆升，市民生活非常困苦。在這段異常艱辛的時期，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民間慈善組織東華三院亦面臨創辦以來最嚴峻的考驗和挑戰，人材流失、財政枯竭，東華藉著緊縮開支、變賣物資維持基本服務，與港人共度時艱。東華在日佔時期面對甚麼困難？還繼續提供甚麼服務？它與日佔政府的關係怎樣？與港英政府統治時有何分別？它變賣了甚麼東西？最終如何熬過這段日子？本講座將一一為大家解答。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